胡適與郭沫若總目

第二篇 分論

(I)胡適

第三篇 餘論

胡適與郭沫若細目

革命的意義……我國最早喊着革命口號的——革命與改良與改革——譬如房屋——胡適的革命論——加上一種有意識的鼓吹——加上一鞭——改良論——革命事業那有這樣輕便

（丙）文學革命的原素

不具仍何狹隘的派別觀說——根本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必須具有革命熱情的人——革命者的三條件——認清文學革命的目標——文學革命不是文字革命文體革命——文字本體上革命……文字運用上革命——文體順着自然變易——文體隨着時代演化——只能說是文學革命一方面……正如鄉下大姑娘上都市——這次文學革命的份子——胡適却在例外——胡適所喊的革命八事——只注重文學文體兩方面——做了費舒脫瑪志尼就能夠醫國濟時嗎

（丁）文學革命前的文學革命

中國文學界域裏表顯着革命運動的有三次……韓昌黎對着六朝駢文所喊的攻擊口號——在他以前還有許多革命而被埋沒的英雄——韓昌黎所受的影響——間接的——

祛除貞操觀念——痛詆荀學——鼓吹革命——空前驚人的男女性慾論——志在衝決網羅——晚清思想界的彗星——革命先驅者夏曾佑——梁啓超的破壞力——舊思想的總批判——由時務報到新民叢報——爲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橫的方面——大砲驚醒了久酣的迷夢——思潮隨着門戶開放湧濆進來——文化侵略與文明供給——最早的譯書——嚴復所介紹的新思想——只用耳朵的林舒——馬君武的譯詩——曼殊與拜輪——這都是這次革命的先鋒隊

（戊）文學革命的形成

在整個思潮上說——綜的方面——革命的範圍仍是過去範圍——橫的方面——主要素因有三——國內封建勢力復熾——國外革命成功——舊文學最後掙扎——樊增祥——葉德輝——鵪鶉子——胡先驌——嚴復——林舒——章士釗——在這次革命中的各個分子——運動的保姆蔡孑民先生——至少他是贊助的一個重要份子——偏袒的態度——林嚴的自慰語——不能忘了陳獨秀——介紹過新思潮——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革命軍三大主義——改良中國文學要以白話爲正宗不容反對——白話完

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思想革新方面的高一涵吳虞——深刻研究方面的錢玄同劉復沈兼士——實行寫譯方面的周氏二兄弟——這具有新的時勢新的產兒遂英挺而堅實的步調邁進中國文壇走到建設的大道上去

（己）文學革命的影響

文學革命的結果——三種成就——文學本身上——散文方面——小說方面——詩歌方面——戲劇方面——顯然中國文學史劃了一個新的時代——教育上首先受其影響——參加政治運動——啓發社會

（庚）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成就

分三層說——經過和事實——文學革命的前一幕——改良八事——陳獨秀合十贊嘆——陳丹崖的譏誚——錢玄同對于「典」的意見——劉半儂的改良文學觀——大家齊來嘗試——從歷史上找些證據來服悉古文家之心——白話的三解——八事改爲八不主義——進行次序的三步——胡適的本心和態度——煩毛細身遮不住猢猻尾把！——又恐怕矯枉過正——倒背了槍——鳴鑼收軍罷——孫行者七十二變——總結胡適

(乙)史料問題

原料與副料——除了詩經以外的書——反證和參稽映襯和互徵——僞書中的史實——半眞半僞的書籍——眞的材料割裂——不僅哲學本身上應該着力——審定史料方法怎樣——證據五種——全在故紙堆中鑽來鑽去

(丙)思想問題

名學不過是哲學的一部分——思想錯誤之一——胡適是痛抵過附會的——思想錯誤之二——哲學的分類——思想錯誤之三——應以全部思想分析——思想錯誤之四——法家問題——思想錯誤之五——

(丁)編制問題

敍述——排列像陳列館一樣——任意顚倒前後——中國哲學的發生——結胎始終來見怎樣結法

分類——說來要氣得發暈——他眞會「生」可惜未「發」——總覺有點不好意思——墨子的哲學呢——莊子不另列傳——荀子單獨標出——輕重失措的孔門弟子——楊

假——真理要變成假理

（戊）孟子

梁啓超說大同書的許多主義——胡適的孟子民權主義——根本上有些搖動——孟子政治哲學——孟子是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他所下的注解——由他的例反證說

（己）荀子

就以名學說罷——墨家與儒家的名比較——有三點要問胡適——孟子與荀子論性的不同

（五）結論

三、活文學與死文學

——白話文學史——

見面禮

白話文學史與性史——辛苦得來——叫中國文學變形——想做一部反白話文學史——

辛苦得來的十大事——有很可自負的地方！——第一說說過不說——第二成份比例上如何——三、四、五、留待再說——第六白話詩來源不清——第七王梵志是什麼東西——第八李白的志行與白話何干——第九不過沒有胡說——第十張籍盧仝的平民意味多少——辛苦辛苦罷了

握手再會

握手握握握手——再會反白話文學史出後再會

四、國學書目的高低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一個是不高不低不知高低的東西——也是「國學」——胡適的研究——後者亦屬不配——思想錯誤——不是初學的門徑——未嘗不對——治國學那是這樣簡單的事！——普通常識也沒有——那裏看出時代性——怎樣伸法怎樣縮法——又何需乎胡適！——分類不清——國學書目分爲三——文學史分一部是什麼意思——春秋左傳列入文

胡適與郭沫若

譚天著

胡適

一 新文化運動的展望

——文學革命——

(甲)文學的解釋

什麼叫做文學？我們翻盡古今中外書籍，是沒有一致的來答覆我們。不過，我們將這許多不同的答覆，歸納起來，有廣義，狹義兩種。廣義的，是包括所有的文字記載書籍都叫做文學；狹義的則專指有韻之文而言，如詩，賦，詞，曲……等。我們把它分開敍述來看：

在中國方面：文學二字連用最早的要算論語中「文學子游，子夏」一句。皇侃疏謂「文章博學」，這當然不能算是確論。要了解孔子所說的文學是什麼？自不能去檢查子游子夏一番。子游子夏文學究竟怎樣呢？子遊的思想和事跡，論語中不多見，古籍中亦少記載，照禮

記檀弓篇內所說，他不外是個禮學家。子夏誠如皇侃所謂「博學」了，他是孔老夫子門徒中傳授最多的一個人，洪邁容齋隨筆說：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於春秋雖不能贊一辭，然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風俗通云：「穀梁赤亦子夏門人」而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所撰者」，更無論矣。後漢徐防上書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言良信云

。這樣看來子夏的「學」，誠可算博，但孔子所誇獎他的，是不是這方面，我們倒沒有把握去證實。不過，從論語中他方面看來，孔子所說的文學，既不是文，亦不是文章，論語上說：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君子以文會友。

博學于文。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煥乎其有文章。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左傳上孔子亦說過：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則此所指文學，似乎有汎指一切的意義，由周秦諸子接近那時許多話證明，亦確有幾分可信。荀子大略篇說：

子貢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非子六反篇說：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尊之曰文學之士。

又問辯篇說：

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

秦蒙恬嘗書典獄文學，（史記蒙恬列傳）漢有文學掌故之職，（史記儒林傳漢令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史記自序說：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由漢初被徵爲文學博士的一撥人考察下來，他們都不僅只會文，或文章，那我們可以斷言。我國對于文學二字，初期解釋，有的專研經濟，有的善長法律……是廣義的，是指一切學術不是限于文或文章的。

　　自後重「文」輕「學」只見「文」的開展，却少「學」的充實，把文學兩字，祇視爲文章，或文的學。南齊書文學傳後論說：

　　文章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

梁書文學傳後論亦說：

　　夫文者，妙發性情，獨拔懷抱。

當時又有文筆之分，把散文屬筆，有韻文爲文，文學範圍，日益狹隘。一直到清，差不多一般對于文學的認識，都是如此見解，對于詩，賦，詞，曲，視爲「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視爲「靡靡之音」。清末章太炎著文學總論特標出文學的意義說：

文學者，以有文字者著于竹帛，故爲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是又將文學變做文法。近人陳獨秀說：

文學有三要素：（一）藝術的組織；（二）能充分表現意志及情感；（三）在人類心理上有普遍的美感。

羅家倫在什麼是文學內說：

文學是人生表現和批評，從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有想像，有感情，有體裁，有合藝術的組織，集此衆長，能使人普遍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

自然他們是吸了些新知識，說來比較有些見地。我們再看外國方面一般的見解如何？

法國批評家瓦納 Vinet(1797—1847)說：

文學是包括人向他人綜合地表現他自己的一切著作。

Literature embraces all Those Writings in Which man reveals himself Synthetically to man.

著作家高考裕 Gawckler說：

文學是一種字句的藝術(L'art de le Parole)所含的種類爲詩 (La Poesie) 散文，(La Prose ecrite)和演說。(L'art oratoire)

美國著明辭書學者胡思德 Worcester(1784—1865)說：

文學是被保留于文字上的學問知識與想像的結果。The result of learning,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Preserved in Writing

濮斯頓大學教授亨德 T,heodare W.Hunt. 說：

文學是思想的文字表現，經過想像感情及趣味，而在使一般人們對之容易理解，而且激起興趣的。

Literature is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Thought,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Feelings and Taste, in Such an untechnical form as to make it intelligible and interesting to the general mind

英國第一號批評家亞諾德 Mathew Arnold(1822—1888) 說：

文學是一個廣大的詞：那是可用爲文字書寫或印刷在書籍上的一切東西。

Liter ature is a great word, It maymean everything written with letters or Printed in a book.

文學家卜魯克 S.Brooke(1832—2)亦曾說過：

文學是聰明男女的思想感情記錄，要使讀者發生愉快而按着方法排列着的。

The written thought and feelings of intelligent men and women, arranged in a way which will give Pleasure to the reader

這些都是空泛，而沒有一定準則的。戴西昆 De Quincy 在詩人蒲白 Pope 論中雖曾將文學分別知情兩方面，然又未定其範圍。龐士德 Pancoast 著英國文學史始將文學分為二義：

（甲）兼包字就文書之屬：出于拉丁語之 Litera，首自字母發為記載，凡可寫錄，號稱書籍，皆是。此為廣義。

（乙）專為述作之殊名：惟主情感，以娛志為歸，注重技巧，一如其他繪畫，音樂，雕刻諸藝；非如科學之專重理智。雖亦採用歷史科學之事實，亦必以瀉情陶性為上，是為狹義。如詩，歌，歷史，傳記，小說，評論等。

較前人諸說爲詳盡了。胡適的文學觀念怎樣？他在答錢玄同的是麼是文學內說：

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

又說：

文學有三個要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

這「三個要素，」好像他分着三個階級：懂得還不夠，還要人不能不懂得，懂得了，還要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感動。

「懂得是明白清楚，」「相信」是「有力能動人，」「感動」是「美」。這個要附會一點說，似乎同陳獨秀所說的差不多，第三項美是陳的第一項的藝術的組織，第一項「明白清楚，」是陳的第三項，「在人類心理上有普遍的美」，第二項「有力能動人，」是陳的，能充分表現意志及情感。不過各人的觀感不同，志趣各異，『大學的國文教授看了』『明白』，一般人『看了』不一定明白，你看「美」我看不一定美，你能夠『感動』，我不一定能夠『感動』，這個『界說』，看來總覺有些太渾籠能，他末了，他不承認，文學有一定的範圍，他說：

「我不承認什麼純「文」與「雜文」，無論什麼文，（純文與雜文韻文與非韻文）都可

分作「文學」的，與「非文學」的。

要依這樣說法，假設我們要做一部文學史或文學概論，到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各個文，集以及一切書籍裏面，不一定是全『文學』的，或全『非文學』的。我們要把「文學的」歸一類，「非文學的」歸一類，猶如像『白話』文學出一部史，「非文學的」，它至少是演變的，也未嘗不可以出一部史到是洋洋大觀，然而這非胡適去做不行，別人是沒這大膽厚顏的。

(乙)革命的意義

革命的意義我們不必多所引證。我國最早賦着革命口號的湯武，他是革夏商政治腐敗命的，一百四十年前的法蘭西，它是革過去政體專制命的，辛亥革命，它不僅革去政體，他還想培植民族思想，提高民權，注重民生，革去滿清封建政治的意識。所以革命與改良，與改革，是有大的分別：改良是就原有形態之上略為改善，是換湯不換藥，如歷代帝王登極之時，對于過去某種設施，有不良的現象，總得有一番詔令，以光光表面；改革是較改良為積極，但亦不如革命的徹底，譬如房屋，改良不過將牆壁粉刷油漆，改革是移樑換柱，改大作小

，或改小作大；革命則徹底將原有一律推翻，從新建築。所以革命不僅是破壞，在能于破壞後，還來建設，來更好的建設。舊的木石，固亦有可爲新建設之用，但大部分還須新的材料，新的更善的材料。胡適的革命觀，他則另有別解。他說：

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着自然趨勢，加上人工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有時候自然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是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爲時間忽然縮短了，因爲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一鞭。（白話文學史引子）

加上一鞭在革命意義，固可這樣講，在改良改革方面亦何不如是。「加上一鞭」「人工督促」，是革命，清末立憲何嘗不是「加上一鞭」？「人工督促」？當然，革命是「人工督促」的，歷史進化的自然演化，是脫離「人工督促」嗎？他曾說：

順着自然變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產嬰兒，這是演進。在演進的某

一階段上，加上人工的促進，產生急驟的變化；因爲急驟的變化，表面上好像打斷了歷史的連續性，故叫做革命，其實革命也都有歷史演進的背景，都有歷史的基礎。

這只是一段改良論，何嘗是革命的定理？改良是應有的過程，革命是突然的變化，瓜在藤上，胎兒在母體中，瓜爲藤之一部分，胎兒爲母體一部份，瓜落胎兒產生，則已與藤與母體分爲二，這不僅是改良和演進的程度上差別，這是有根本上獨立的特徵。「表面上好像打斷了歷史的連續性」，「表面上看去好像一個革命」，這是澈底的革命嗎？僅「有的加上一蹴」，革命的事業，那有這樣的輕便？

(丙)文學革命的原素

說到文學革命原素，我們假設泯除成見，不具任何狹隘的派別觀念說，我們可以援引曾在中國文壇上大開筆戰的的魯迅和成仿吾兩個人的話來一說。魯迅說：

我以爲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是的則無論寫的什麼事件，用的什麼

材料，却都是革命文學。

成仿吾說：

如果文學作品，是要革命的，它的作者必須他具有革命熱情的人；如果要是永遠的革命文學，它的作者還須徹底透入而追蹤到永遠的真摯人性。

他們雖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他們對于文學革命認識，却無二致。是的；不是「革命人」，沒有「革命熱情的人，怎樣能夠談革命，談一切的什麼革命。一個革命者，第一要有決心，第二要有勇氣，第三要有一貫的主張，不僅是紙上空談，還要實地做去，徹底的做去。認清所要革命的目標，不問成敗，且不問效果，本着主張，拿住勇氣，決心地去不顧一切幹一下。文學革命，當然也不能在此例外。不過既然是抱文學革命的目標，那末所要革的「命」，是文學，不是文，不是學，也不是文的學。

文學革命，不是「文字」革命，也不是「文體」革命，這是容易認識的。在過去由甲骨變鐘鼎，變大篆，小篆，變隸，變楷，變行，變草，這是文字本體上的革命，當然不能說是文學革命。

由「粵稽」……（書經堯典）換「嘗考……」（兩漢以後文字中嘗用之）由「些」（楚詞）換「兮」（漢賦）由「比歲……」（如康有為中國顚危誤在于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比歲舉國文章背經舍史）換「年來……」，（如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年來頗于此事再四思研）以及文學革命時代，（現在亦然）胡適前期文章用「之」用「矣」用「乎」，後來換「的」換「了」「嗎」這是文字運用上的變換，更談不到文學革命。

周秦的文字，革周秦以前古奧短促的「命」，漢的文賦，革周秦散漫不齊的「命」，六朝的駢文，革漢的疏注瑣屑的「命」，唐的文章，革六朝豔詞麗句的「命」，宋的語錄，革唐摹擬仿效的命，清的八股，革宋雜抄隨筆的命，梁起超式的報章文，革清聲調格律的「命」，這是文體順着自然，或受他種關係反響力，算不得文學革命。

由詩（詩經）變騷，由騷變楚詞，由楚詞變絕律，由絕律變詞，由詞變曲，由曲變戲劇，這是隨着時代演化，單獨的文體上變換，也算不得革命。

文學革命，在字句，在體裁，雖亦變換，但只能說文學革命的一方面，只是字句上，體裁上變換更易，而不顧及本身意義，時代思潮，正如鄉下大姑娘，給他燙髮，搽雪花膏，着

高跟皮鞋，穿跳舞衣裳，這樣學時髦只更表顯着他的醜陋，是什麼革命。

這次文學革命分子中，顧到文學本身意義，時代思潮的固有，但胡適却在例外。

胡適所一再喊着文學革命範圍八事，八不主義中，除了「不做言之無物」「不做無病呻吟」二條外，其他如「不用典」，「不用成套爛語」，「不重對偶」，「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語俗字」，無一不是只看見文字文體兩方面，而忽視文學。即把它「建」起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他看見一點文學的眞意義嗎？

即不做「言之無物」文字一條說，他雖是說不是「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而是「着意於情感思想兩點」，情感思想過去的文學，是完全都沒有嗎？

「不做無病呻吟文學」所說的更不成話。「病國危時」，固然不是「痛哭流涕所能收效，做了費舒脫 Fichte 瑪志尼 Mazzini 就能夠醫「國」濟「時」嗎？文學革命的目的，是不是如此呢？假設眞是如此的，那末胡適所唱革命文學十幾年了，爲什麼「國」病日深，「時」危日甚，你還在一方面批評現政府，一方面還理想努力好人政治，做官迷呢？

(丁)文學革命運動前的文學革命

在這次文學革命運動以前，中國文學界域裏表顯着革命運動的有三次：一次是唐，一次是明，一次是清末民初。

「文以載道」，「文起八代之衰」，提起這兩句，稍爲知道一點中國文學的人，一看大概就曉得這是韓昌黎在唐朝文學界中，對着六朝駢體文所喊的攻擊口號。其實在他以前，還有許多不出名的英雄，北朝宇文泰和蘇綽隋的李諤都對四六下過攻擊令。就在唐朝，唐初陳伯玉以經典體格爲文，盧藏用富嘉謨隨聲附和，但世染六朝委靡之習甚深，少人注意。開元天寶間蕭穎士李華賈至張總元結雖崇尙古文，亦少影響。晁公武說元結，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說其「文章奇古不蹈襲」可見元氏不同流俗的態度。至韓昌黎雖肩着革命名義，而間接是受陳子昂的影響，直接是受獨孤及梁肅的影響。

宋祁說：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雅正。新唐書本傳

李舟獨孤及常州集序亦說。

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泝頹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

柳宗元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說：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

而韓愈薦士詩有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程振孫于書錄解題乃直說

子昂首起八代之衰，

我們只要展開他的文章一讀，「振衰起廢，不亞韓文」這些話，並非過譽。

獨孤及嘗受知于李華，梁肅師事獨孤及。韓愈曾從獨孤及梁肅的門下往還，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說獨孤及

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風，

唐實錄則直說

韓愈學獨孤及之文。

北夢瑣言傑光子說：

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顏謝，其所宗仰者，惟梁補闕一人而已。

並且代爲不平說：

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塵喧喧者，宜鑑其濫吹也。

「俗塵喧喧，宜鑑其濫吹，」爲多少高呼革命者痛下針貶。

韓愈的成就，得力于獨孤及梁肅二人如此，故唐書本傳說：

大歷正元之間，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洎舉進士，投文于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于時。

「鑽仰」成功了，投文公卿間成功了，由是「知名于時！」化的「文學」究竟怎樣呢？唐書本傳上說：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出世，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

這是在文學外體上革命。蘇東坡韓文公碑誌說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法，是皆有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

這是在文學內含上革命。他的門人李翱李漢皇甫湜復推波助瀾，六朝的駢文，總算被他打倒，這是中國革命文學史第一次成功。他的意義和價值，卻是另一問題。

道統的觀念，一直傳到明朝，首先揭起反叛旗幟的是公安派。公安派的領袖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們主張是：

獨抒性靈，不拘體格，

八個大字。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傳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張之。詩文亦然；不容不變也。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為「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才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剽竊所以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沈痾之法體也。

他們反對模擬：

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句句準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曷嘗字字準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秦漢，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袁宏道集）

今之圓顱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

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撥棄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乎？（袁宗道白蘇齋集）

他們反對復古：

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絀于法，而不敢自伸，其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于習，而愚者樂于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亦可羞矣。（袁中郎集薛濤閣集序）

又說：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之時，襲古人語，言古人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爲之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他們反對法則：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于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其奇則境必狹，而僻則其務爲不以根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因宋唐而有法也。同前

他們以爲

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而欲強笑；亦無可哀，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模擬耳。（袁宗道白蘇齋集論文下）

而袁中郎批評江進之詩說：

信腕信口皆成律度

這種卓識，這種大膽，可惜一般人正迷夢于八股括帖之文，未能喚醒迷夢，不然那裏還臨到胡適之來喊什麼革命哪？

他們的見解如此，他們詩文，都能照所說的做去，不過結果流于空疏浮泛，這次革命，竟不幸因之埋沒，那就不能不讓清末第三次的舉義，而留下許多種子給胡適成功了。

第三次文學革命運動，因爲時代不同，兼受外來軍事，思潮兩方面迫促，他們努力更因，主張更烈，成功更有可觀。分開來說：

在綜的方面：這種子早播于甲午一役，大家因爲感覺國內政治腐敗，事事都想去舊換新，文學也就隨之轉變，走上新的道途。

首先應該說的，自然要從康有爲公車上書起：

和議告成，割地賠款，創深劇痛，一般士子忍無可忍，于是由康有爲聯絡十八省三千舉人，公車上書，將以前專寫訓詁考據死的文字，搬來代表一般所要說的話，根據革命的意識，來借羣衆運動表現，這是東林伏闕上書後第一件驚人的舉動，而範圍更爲擴大，目光更爲

深遠。在中華外人，也引起深切的注意。所以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閱書稿，並倩人傳鈔，刻成公車上書紀，主和的軍機大臣孫毓汶，畏怕不敢上朝，遂致去位，康有爲作詩一首紀其事說：

海東龍泣艦沉沒，上相輶軒出議和；遼臺臙臙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連名三千轂相摩，聯軫五里塞巷過；臺人號泣秦楢歌，九城謠諜徧網羅。扛棺摩拏，鼙鼓三撾，檜避不朝，辭位畏訶。美使田貝驚士氣則那！索稿傳鈔，天下墨爭磨。嗚呼！椎秦不成奈若何？

由這首詩看來，可見那時的義憤，那時的影響，那時政府的驚畏，那時的世界人士注意。我們不管他後來說什麼保教保皇，那時他能激發士氣，復生死文字，他能在四千年來專制政體威壓之下，拉着一向專讀死書晶頂補褂的舉子，一紙萬言書，竟嚇退奸賊，不敢上朝，這種偉舉，在文學革命運動歷程中看，他可算是一個開發者。

他的詩歌慷慨激昂，可以見着是具有革命的狂熱。如愛國短歌行神州萬里風泱泱；崐崙東南海爲疆，岳嶺迴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涼，以花爲國絲爲

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遠。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裔入貢懷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獨尊主人位。
今為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衆民霸國資。徧擧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
速成學藝與汽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遊天地，舞破大地黃龍旗。

這詩雖是，不免受了歷史餘毒有些誇大狂，但可以振起那時銷沈的士氣。他在詩集自序內說：

吾實好謳詩，而學在擇理，既不離人性，又好事，不能離肝嘔肺以為詩人。然性好遊，嗜山水，愛風竹，船脣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為學，則餘事為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遭禍，遁迹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託為詠歌，莫拔仰寥磊落之懷。日行連犿奇偉之境，臨睨舊鄉，遍回故國，閱刼已夥，世變日非，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嚙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攜首，遊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于詩，情在于斯。噫氣難已，奔亡無定，散

失彌多。門人梁啓超請收拾殘稿，發願手寫，搜篋與之，僅存千餘篇。亡人何求，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詠歎淫佚，瑣者遣情，勞者歌事，小雅國風之所不廢也。後之誦詩論其事者，其亦無罪耶！

很可看出他的詩境。光宣詩壇點將錄鄰廬說他的詩是：

入乎古人，出乎古人；直有扶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巳。

他的思想，可以拿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三部巨著去代表，他本想毆倒古文家，建立今文學中心的理論，但思想界却因之解放，因之懷疑故籍，因之而精心探討，引起後來一班研究諸子，古史的興趣。這種功績，在他自己或不覺得，在歷史意義上則不可泯沒，雖是未有標明革命旗幟，而已含着革命情緒。我們只看過去的今文或古文家，無論你自已說得怎樣嚮響，有那個敵得上這三部有系統的巨著？新學偽經考的內容，大概分着：

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凡古文皆劉歆所作。

二、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

三、孔子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

四、劉歆欲彌縫其作僞之迹，故校中祕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羼亂。

五、劉歆所以作僞經之故，因欲佐王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

梁啓超說：「此說一出，而所生之影響有二：

第一、清學正統派之立脚點根本搖動。

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

的確，清學正統派立脚點動搖了，然今文學自家也受了不少的影響。後來研究新的國學者，很少不承他的餘緒，不過戴着洋人綠色或黃色的眼罩，加上些色采罷了。

孔子改制考據梁啓超說，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響：

一、教人讀古書不當求之章句，訓詁，名物，制度之末，當求其義理。所謂義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創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漢學宋學，皆所吐棄，爲學界別闢一新殖民地。

二、語孔子之所以爲大，在于建設新學派，鼓舞人創作精神。

三、僞經考旣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爲劉歆所僞造，改制考復以眞經之全部分爲孔子託古之

作，則數千年來共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

四、雖極力推挹孔子，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創學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于諸子之列。所謂「別黑白定一尊」之觀念，全然解放，導人以比較的研究。

換句話說，古文家的命，是算革着了，連自己立場，今文家的命也革了不存多少。

大同書的革命思潮更可觀了。他本春秋三世——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之義，來解釋禮運。謂：升平世爲小康，太平世爲大同，禮運就是我們孫總理親手所寫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殖其棄于地也不必藏諸己力疾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

他本着這個意思，分爲

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

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易人。

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九、成年男女，例次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為最嚴之刑罰。

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

說這是孔子理想的制度。梁啓超說，這存有民治主義，（天下……與能）存有國際聯合主義，

（講信修睦）存有老病保險主義，（使老有…有所養）存有共產主義，（貨惡…藏諸己）存有勞作神聖主義，（力惡…爲己）但我們不管他是什麼主義，我們也不問孔子是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只覺得說前人所未說，說前人所不敢說的這一番話，至少可以引起文學領域中意義的變換。

黃遵憲他曾做日使館參贊，新嘉坡舊金山總領事，自然他所受外界影響不少。不過他自幼即排斥尊古，不受拘牽，主張以俗語入詩文，他的雜感中有云：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
以我視後人，若居之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
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爇香煙；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斕斑。

這裏的意思，只是「我手寫我口」五個大字。人境廬詩草自序雖是欲「復古人與比之法，」「用古人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但他「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

不襲其貌，」故他「取材」是：

自羣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品名切于今者，皆取而假借之。

他述事則：

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及，皆筆而書之。

而詩格：

自鮑，曹，陶，謝，李，杜，韓，蘇迄于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爲我之詩。

詩境是：

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于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

不避「方言俗諺，」方能寫「爲我之詩，」「不與古人同，」方能「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篇中如：

⋯⋯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八，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諸父。因裙便惜帶，將縑難亂素。老人惜偏愛，不顧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像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腳，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噀血噴滿壁，盤礴畫龍蛇。兄妹呢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射我耳，勸婆要加餐；金盤膾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留老人歡。

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見兒大父旁，一語三摩娑：「此兒生屬猴，聰明較猴多。雛鷄比老雞，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着宮袍。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簫；猪雞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飄。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誥；子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

直是白描聖手，不避「方言俗諺」，而「方言俗諺」，亦不覺其扞格生澀。今別離四章：

別腸轉如輪，一刻已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
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並力生離愁。明白須臾景，不許稍綢繆。
鐘聲一及時，頃刻不稍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
送者未及還，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否？
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已極，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
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
祇有斑斑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
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相聞，使我容顏悴。
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剪中衣，是妾親手縫。
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面君，仍覺心忡忡。

鸞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匳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

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

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

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

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舉頭望明月，明月方入扉，

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之萬里，晝夜相背馳。

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祇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

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有「古人未有之物，」闢「古人未闢之境，」難怪梁啓超獨許爲

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

並且還說：

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呢。

最先在文學——詩上標着新舊名目的，就不能不首數敝宗譚嗣同。他曾將他自己所作的詩分爲兩個時期：在甲午以前的，叫它作舊學；在甲午以後的，叫它作新學，他所謂新學的詩，是不避俗語，雜入譯名，如金陵聽說法云：

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臨說偈言；一任法田買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

綱倫慘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庵摩羅果掌中論。

（梁啓超云：喀私德即 Casot 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巴力門即 Parli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云：

復生自憙其新學之詩，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于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遠勝于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復生亦綦嗜之。

然其詩之好壞爲另一問題，以譯語入詩，亦如宋人以佛語入詩，入文，而謀解放與獨造的精神，則爲宋人所不及。

但他還不僅此，他痛恨此等，無用之呻吟的詩，他總憤欲廢棄，莽莽蒼蒼齋詩自敍云：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猶不自懲，而爲此無用之呻吟，抑何靡歟？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謂考據詞章，垂垂盡矣！勉于是無一當焉，憤而發篋，畢棄之，劉君松芙獨哀其不聊，勸令少留，且擷拾殘章，爲補遺，姑從之云爾。

這並不是他矯情，他實在是看不起這些東西，和饒仙槎除夕感懷詩敍中說：

竊作除夕詩甚多，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亦不能休。已而，碎其稿，與馬矢革塵同朽矣。

這種勇氣，這種革命精神，差不多與做放屁文的吳稚暉想同友人將中國古書放在茅廁裏同樣的澈底。

至梁啓超所說他的學是怎樣？胡適之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內亦說：

譚嗣同的仁學，在思想方面，固然可算是一種大膽的作品，在文學方面也有代表時代的價值。

我們拿仁學來說罷：

（一）去古取新　他說：「古而可好，又何必今之人哉？」他從三方面證明古之可去，而新之可取！

（甲）進化論「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縟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曰改過，佛曰懺悔，耶曰認罪，新之謂也；孔曰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進爾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則新也者，夫亦羣教之公理。歐美兩洲以好新而興，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古既不可好，曷爲而讀古之書哉？曰，所貴乎讀書者，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逮焉耳。苟以亦其蹟而已，則不問理之是非，而但援事之有無，鳥獍四凶，何代蔑有，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

（乙）孔子學說「孔子亦去古取新，鄭玄箋詩，盲從之適，謂當自殺以崇古人，而嘗笑其愚。今之自矜好古者，寗不是自殺以從古人？孔子則不然。刪詩則斷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綢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于獲麟，默知非變法不可。于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嘗好古之云云也。（按譚

說論語述而第七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爲「述」，竄入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十四字，以申其古學篇名，遂亦好「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生知」與「敏求」相反相對，文義自足，無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語意，都不連貫，是以歆竄矣。）

（丙）文字學　於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草則苦，從木則枯，從网則罟，從辛則辜，從文則故，從口則固，從歹則殆，從疒則痁，從鹽則盬，從牛則牯，從疒口則痼，從口水則涸；且從人則估，估客非上流也；從水爲沽，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爲姑，姑息之爲細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

（二）排斥名教　「俗學鄙行，動言名教，敬苦天命，而不敢渝，畏者國憲，而不敢議。嗟乎！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臣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

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既為臣子之專名，則終必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敢忠孝之名，為名教之上。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

（三）解放男女不平　「重男輕女，至暴亂無禮之法也」。「男則姬妾，羅侍，放縱無忌，女則一淫即罪，至死馴，至積重流于溺女之習，乃忍為蜂蟻豺虎之所不為」，「夫既自命為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

（四）袪除貞操觀念　「於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自主之權也。自秦垂暴法，宋儒煬之，忘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謬說。直于室家施申韓，閨閫為犴獄　尤可憤者，亡則瀆亂夫婦之倫，御妃多至不可勝計……」

（五）痛罵荀學　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不此兩支，皆絕不傳，荀乃乘間冒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箝制束縛

之具不緊也。」「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六）鼓吹革命　天下爲君主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君主者乎？其士則穢壞也；其人則糟粕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逞其凶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爲未饜，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吾華人愼毋言華盛頓拿破倫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亦足以申民氣，倡勇敢之風。

其更有答前蹤人言論，是：

若夫世之防淫，適以招人于淫。曰立淫律也，曰禁淫書也，曰恥淫語也，信乎達者之難觀也！夫男女之異，非有他，牡牝數寸之閒耳。猶夫人之類也，人錮之嚴之，隔絕之，若鬼物，若仇讎，是重視此數寸之牝牡，翹之以示人，使知可貴可愛，以艷羨于淫。然則特偶不見而已，一旦瞥見，其心必大動不止，一若方苞之居喪見妻

而心亂。

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毫無可羞醜，而至與人間隙也。得西醫之進化學者，評考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彙範臘肖人形體，可折卸諦辨，多開考察淫學之館，廣布闡明淫理之書，使人人皆知其所以然，徒費一生嗜好，其事乃不過如此如此，機器焉而已，未有不廢然而返者。

總之：他志在『衝決網羅』，于政治，于社會，于思想，以及文學皆欲脫盡傳統的思想束縛，努力解放。這在這次革命運動中，是算最有胆識的人。你看他，在戊戌政變發覺之先，會有日本志士勸其東游，他說：

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吾國數千年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是何等氣慨，何等精神，何等勇氣！有這種氣慨，才配談革命，有這種精神和勇氣，然後才可以談一切革命。

夏曾佑梁啓超稱他爲「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又說：「穗卿是吾少年做學問最有

力的導師，」飲冰室詩話中並說：

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挦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復生亦嗜之。

可見當時他們所受他的影響。他贈梁任公詩

壬辰在京師，廣座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洎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春騎醉鶯花，秋燈狎圖史。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振盃起，跌宕笑相視。頗爲宙合間，祗此足歡喜。夕逢從東來，孤帆更南指，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吾子尙靑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子爲泰否。

梁啓超附注說是：

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也即基督教裏撒但。陽烏即太陽，日中有烏是相傳的神話。淸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了沒有呢？且不管

；我們吵到沒有得吵的時候，便算問題解決，我們主觀上是認爲打倒了。

可見他也是以俗語入詩，而主張打倒荀卿的。

在文學革命中，具有很大功績，而被一般革命者忽視的王靜安先生，他的努力，我覺得比僅嘴裏喊着口號，手中拿着旗幟的所謂革命份子，來得實際。紅樓夢評論是光緒三十年做成的，宋元戲曲史是民國元年做成的，他認定

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爲其頂點。（紅樓夢評論）

他的理由，是

以其描寫人生故。

他看重文學家的功用，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則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壞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則其遺澤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臘之有鄂謨爾也，意大利

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狹斯丕爾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國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無與焉！彼等鼓舞國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國民之所恃以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遺澤，決不能如此廣且遠也。（靜庵文集教育偶感）

他見到中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

試問我國之大文學家，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如希臘之鄂謨爾，英之狹斯丕爾，德之格代者乎？我人所不能答也，殆無其人歟？抑有之而我人不舉其人以實之歟？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說，則我國之學不如泰西，由後之說，則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前說我所不知，至後說則事實較然，無可諱也。我國人對文學趣味如此，則于何處得其精神之慰藉乎？……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為之謀，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同上）

他深知世人不能賞識文學，

「自謂頗騰達，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負乎？「

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韓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馳驅猶望兩河平』非陸務觀之悲憤乎？如此者，世謂之大詩人矣！至詩人無人抱負者，與夫小說，戲，曲，圖畫，音樂諸家，皆以優仟優倡自處；世亦以優仟優倡蓄之，所謂『詩外尚在，』『一命爲文人，便無足觀，』我國人之金科玉律也！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託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人之迫害，而無人爲之昭雪者也：（靜庵文集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

又說：

更轉而觀詩，歌之方面，則詠史懷古感事贈人之題目，彌滿充塞于詩界；而抒情敍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術上之價值者，僅其寫自然之美一方面耳。甚至戲曲小說之純文學，亦往往以勸懲爲指，其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世非不知其貴，且加貶焉。（同上）

他的文學對象，是『純粹美術上之目的』和『自然』，他以戲曲小說爲『純文學』，小說

中獨推紅樓夢，戲曲獨賞元劇。他說：

苟知美術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夫以人生憂患之如彼，而勞苦之如此，苟有血氣者，未有不渴慕救濟者也。不求之於實行，猶將求之于美術。獨紅樓夢者，同時與我人以二者之救濟。人而自覺于救濟則已耳。不然則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歡迎之也。（紅樓夢評論）

又說：

元雜劇，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之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韓文靖邦奇）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擯元劇不觀，其見元戲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五七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勝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與否，尚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

以自然勝，而莫著于元曲。（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

元南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則亦不過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同上第十五章元南戲之文章）

他激賞紅樓夢壯美：

此書中壯美之部分，較多于優美之部分。……玆舉其最壯美者之一例，即寶玉與黛玉最後之相見一節，曰：「那黛玉聽着傻大姐說寶玉娶寶釵的話，此時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酸苦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有到沁芳橋畔，脚下愈加軟了。走的慢，且又癡癡迷迷信着脚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隄往向裏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上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

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見寶玉在那裏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瞧他嘻嘻的獃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瞧着寶玉笑，兩個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獃笑起來。忽然聽了黛玉說道：「寶玉你爲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却又不答言，仍舊獃笑起來……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着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飛快。」(第九十六回)如此之文，此書中隨處有之，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人不經驗之也。(紅樓夢評論)

我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戲曲小說，無往而不着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享。——非是，而欲饜

他估定紅樓夢價值與我國人相反的精神：

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廂記之以驚夢終也，未成之作也。此書若成，吾烏知其不為續西廂之淺陋也！有水滸傳矣，曷為而有蕩寇志？有桃花扇矣，曷為而有南桃花扇？有紅樓夢矣，彼紅樓復夢補紅樓夢續紅樓夢者，曷為而作也？又曷為皆反對紅樓夢之兒女英雄傳？故我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而身歷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張道士之一言。以歷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縲絏之中，所索之女子，纔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戚，而非以描寫人生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于我國人之精神，而有價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紅樓復夢等，正代表我國人樂天之精神者也。(同上)

他將紅樓夢比浮士德

夫歐洲近世之文學中，所以推格代之浮士德為第一者，以其描寫博士浮士德之苦痛，及其解答之途徑，最為精切故也。若紅樓夢之寫寶玉，又豈異于彼乎。……且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發揮之，我輩之讀此書，宜如何表滿足感謝之意哉！（同上）

他于「紅樓夢作者究竟是誰」，表示遺憾！

我人于作者之姓名，尚未有確實之知識，豈徒我儕寡學之羞，亦足以見二百餘年來我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誰使此大著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書之精神，大背于我國人之性質及我人之沈溺于生活之欲，有如此也，然則，予之為此論，亦自知有罪也矣。（同上）

而認為對于

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同上）

他覺元劇的好處：

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髣髴也。（宋元戲曲史自序）

他推崇元劇的文章

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目前，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同上元劇之文章）

他贊成元劇以俗語入文：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劇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仝上）

又說：

元劇實于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于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負于此者，實不少也。（仝上）

他這許多見解，都是文學革命運的前十年，他已代他們說過。但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沒有他，胡大博士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也不提他。以他倆個博學（？），我像不會是沒有看到這兩部書，而終是不爲一言的原故，依我淺薄揣想，恐怕是「長了他人志氣，滅了自己威風」罷？——因爲他們這二書，都是表顯自家功績的生傳。

梁啓超的「破壞力確不小」，他對于舊思想的總批判是：

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于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矣，而皆持所謂表彰某某罷黜某某者，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他人，以爲非孔教。……寖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于一點，不能自闢生面，如羣猿得一果，跳躑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

情狀抑何可憐！……此二千年保教黨所生之結果也。……（壬寅年新民叢報）

對于半新半舊的思想估計，是：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于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眞理也；萬一徧索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其爲眞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眞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

又曰：

摭古書片詞單語以附會今義，最易發生兩種流弊：一、倘所引證之義，其表裏適相脗合，善已；若稍有牽合附會，則最易導國民以不正確之觀念。而緣郢書燕說以滋弊。……二、勸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嘗行也；」勸人治此學，告之曰，吾

先哲所嘗治也；」其勢較易入固也。然頻以此相詔，則人于先哲未嘗行之制，輒疑不可行；于先哲未嘗治之學，輒疑其不當治。無形之中恆足以增其故見自滿之習，而障其擇善服從之明。吾雖不願采擷鄰牆桃李之繁葩，綴結于吾家杉松之老幹，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誠愛桃李也，惟當思所以植之，而何必使與杉松淆其名實者。（乙卯年國風板）

故他

> 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

他的西哲學統一斷和外史麟爪等，就是代所想移植的工作。文學方面，雖是他自己也感覺「粗率淺薄」，但「粗俗淺薄」，最易明白，最易普及。文體解放方面說，第一步這是不可免的事實。所以他亦說：

> 平心論之，以二千年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

本來，要談革命是必得要「鹵莽疏闊」手段才行，像胡適那樣提首提尾，這不是革命的態度

，他雖是自謙說建設未有所謂，但他

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自解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于讀者，則有一種魔力焉。

影響亦是很大！他：

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爲無限制的儘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分擔不能。

所以他對于革命的見解：

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新名詞爲革命，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

「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這是他的文學革命觀。不過，他

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

歷若干時日，移于他業，則又拋棄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棄故，故入焉而不深。

故

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但，他

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以上均見清代學術概論）

這到並不是自負！所以錢玄同寄陳獨秀信中說：

梁任公實為近來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贊同；即其文章亦未能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新說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皆用全力為之，未嘗分輕重于其間也。）此皆其識力過人處。

亦並不是過譽。陳胡繼起，擴大範圍，徹底改革，遂由梁氏結束第三次革命史，而另創第四次所謂文學革命之新世紀了。

在橫的方面，清末海禁大開，信使往還，互有交換知識之必要，而中國所需猶殷。康有爲在北京保國會演說，曾說：

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十瑤臺閬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弓手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外國講求情形之始。敗于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襲天津，乃開五口。……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款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駐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五年斌椿遍游各國，學子

游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稍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設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全日磾，實爲當時絕時之事。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阻之。自是雖輶軒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雅南譯書畧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兩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祇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年之役，割臺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于是海內繽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

甲午一役，確實大砲驚醒了久酣的迷夢。門戶開放了，思潮立隨着門戶開放湧濆進來。但上海製造局所譯，多科學之書，如理，化，兵，工，算學之類。而官書局多翻印古書，所謂，「

天下之士」，雖知「講求」，但不懂西文，無從窺探人之奧祕，所賴于製造局，官書局，實覺不敷所用。外人在內地遍設教堂，明爲宣傳教義，實則爲文化侵略的初步。但文化供給，卻亦不少，在知識貧困的中國人羣中，因之得了許多未夢見的事物。一方面只有忍心的感謝，一方面卻自嘆可憐，不過他給我們各方面的影響，總不能不說有相當的程度。

嚴復初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業，習戰術，砲台諸學，兼習數學，倫理，社會，法律，經濟諸學，民初任北大校長，所譯有。

赫胥黎天演論

穆勒名學及自由論（後改名羣己權界論）

斯賓塞爾羣學肄言

斯密亞丹原富

孟德斯鳩法意

甄克斯社會通詮

耶芳斯名學淺說

衞西琴中國教育議九種，他承古文家餘緒，以舊有文字，介紹新的思想，而且他譯書的態度，胡適稱

他對于譯書的用心與鄭重，真可做我們的模範。

他一方面以「用心與鄭重」的態度，一方面介紹許多科學以外有價值的其他諸知識，使得當時不僅知道外國的科學發達，哲理亦甚湛深。他的譯筆，雖不能脫離古文集臼，刻意摹倣，而他在中國翻譯界初萌芽的時候，有此巨製，實亦難得。不過他的觀點，却與我們不同。他說：

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天演論敍）

他是在。「手鍊丼本，祕之枕中」，在「雖劉先生之得荊州不足爲喻」，所以當時古文家，吳汝綸說：

今議者爲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瀹民智，莫善于譯書。吾則以爲今西書之流入

中國，適當吾國廟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文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三者固不足以與文學之事。今西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知之瀹何由？此有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天演論敍）

並許以「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梁啓超卻說

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倣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上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以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爲賢者諱矣，（新民叢報介紹新著原富）

這話很公平，但他說是「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我們現在到不必拿二十年後的眼光，去說什麼，我們只看他拿着思想的鑰匙，啓發翻譯的途徑。這種功績我們是不能抹殺的。

專用耳朶的林琴南，他的天才實不可及，他雖不能直接閱讀原書，但「耳受手追，聲已筆止，」先後譯有一百五十六種之多。他的最大功績，是矯正過去中國文學界，只認中國有文學，外國沒有文學，而在文學之中，他獨能看重一向所輕視的小說——長篇言情小說，所以胡適也不能不說

> 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敍事寫情，也可以算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敍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

但他還有一種高人的見解，橡湖仙影序裏說

> 宋儒嗜兩廡之肉，竊拘攣曲跼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廡之冷肉蕩漾于前也。

文學所以達情，想什麼說什麼，況且食色天性，文學更不能有所隱諱，以泯沒真性靈。

因為他不懂西文，所以不免不受人指揮，以致

> 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授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

這種內心的苦痛表現，是無可如何的。但我想，如果是他眞懂西文的話，他的成就，決不會有這樣的多，因爲顧忌太多，反而阻塞開闢之路。翻譯事業，當然不能不有顧忌，但在那草創之時，却只要這樣的儘量的供給。我們看二十年來許多懂得西文的人，最的總和，與他一人相較，也差不了多少，就可證明他的努力。

翻譯西洋詩的，恐怕要以馬君武最早，他在詩稿中自序說：

此寥寥短篇斷無文學界存在之價值，惟十年前，君武于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固有力焉，以作個人之紀念而已。

他雖說是自己個人紀念，但在文學界中，亦不易磨滅。他以鼓吹新思想標榜愛國主義」：入詩，正如嚴幾道好以天演學說入文，林紓以言情譯小說一樣重要，而影響却有過之！如拜輪哀希臘歌貴推阿明臨岸哭女許虎特縫衣歌讀之都能令人感動，雖是胡適說哀希臘歌「頗嫌君武之失，」但他並不在詞句之間，他的目標是在鼓吹新思想，標愛國主義，惜其過重漢文格律，而原意轉晦。

曼殊是一樣同拜輪嬲冶無依的人。他翹拜輪學說：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

所以他關于拜輪較好的詩，都譯出，如贊大海，去國行，哀希臘，答美人贈束髮𢄙帶，星耶峯耶俱無生等，他的譯筆自許

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

我們看了他的譯詩，的確是「悱惻」之至，這大概也是因為，「自維身世，有難云之恫，」而以至情出之罷？他對于當時翻譯家的批評和翻譯見解，是：

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莎士比彌爾敦，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祇可與杜爭上下，此其所以為國家詩人，非所以為靈界詩翁也。近世文人，均以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乎！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衲均未駐目，林氏說部，衲亦無暇觀之，惟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元書，故嘗誦之，甚為佩服。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書之難也！！前見辜氏譯痴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為一夜脫

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入悅？奈何如羅援氏專爲蒼生者！此觀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墓氏志不在文學，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柄謂凡治文學，須精通文學。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眞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

這樣一個身世可憐的詩人，有這樣的見解，要不是爲環境所迫，感情受了刺激的話，他的創造，總不只此罷？

(戊)文學革命的形成

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形成，在整個思潮上說：縱的方面，過去文學革命的成績，當然給了這次許多便利，實則這次所謂文學革命的範圍，仍然是過去的範圍，不過因時代的進步，——從由內底自覺，而受到外的激刺，遂益完成此種工作；橫的方面主要素因有三：

第一國內封建勢力復熾　辛亥革命後，雖是國體上變換，而舊封建勢力完全存在，北洋軍閥黨羽分佈，處處使革命者不易下手，徹底做去，所以領導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忿而辭職

，而洪憲帝制，復辟運動亦繼之以起，政治上有護法運動，文學上遂有文化革命，均係期望打倒舊的藩籬，以建設新的生命。復古愈促，求新日亟，固屬此中尚留有時間上關係，而相互爭持，最後勝利，總屬新者，這是順着自然進化的趨勢，不可隱蔽的事實。

第二國外革命成功　法國革命成功，已給予吾人不少深刻印象；接着蘇俄布爾札維克政府成立，國內思想界更感受大大的戟刺。雄視全球，企圖世界的德皇威廉第二，亦不能保持他最後偉大君主實力，終被社會黨推翻，革命狂潮，迷漫世界，中國思想界，雖經幾次奮鬥失敗，而這次轉變，不啻更予最興奮的鼓勵。

第三舊文學企圖復活　梁啓超新民叢報式的新文體，雖風靡一世，而漢學家桐城派，則大肆攻擊，章太炎既罵爲「墜于下流」，一般人且視爲「文妖」，于是樊增祥上張之洞序說：

如有佳語，不含雞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

葉德輝答友人書說：

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士之稱唐士，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拚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

東施效顰，得毋為鄰女竊笑耶。

臯臯子且直認為

總種流傳，校風漸染，此亦時文後之一厄也。（林嚴合鈔序）

而受過新思潮洗禮的胡先驌嚴幾道，亦說：

梁啓超之文，純為報章文字，幾不可語夫文學。其筆鋒常帶感情，雖為其文有魔力之原因，亦正其文根本之癥結。如安德諾論英國批評家之文，目的在感動血與官感，而不在感動精神與智慧」。故喜為浮誇空疏豪岩激越之結，以炫人之耳目，以取悅于一般不學之「費列斯頓」。其一時之風行以此，其在文學上無永久之價值，亦以此。（胡評胡適五十年之中國文學）

更且認為

往者蔣觀雲嘗謂梁啓超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嘗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倡暗殺，則黨黨以暗殺為地義。……大抵任公操筆為文時，其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諺所謂出風頭之意多。莊生謂蒯瞶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法文

發所謂革命風潮起時，人人要走直線，當者立靡。德文豪齊德戲曲中有鮑斯特者，無學不窺，最後學符咒神祕術，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陰森獰惡，六骸震動，問欲何為，鮑大恐屈伏，然無術以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筆端攪亂社會至如此矣！然惜無術再使吾國社會清明，則于救亡本旨又何濟耶！

任公筆原自暢達，其甲午以後，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而轉念乃云吾將凝隨時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可喜之論。至學識稍增，自知過當，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然而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並不為悔艾者留餘地也。（嚴幾道書札）

不曾甚如猛虎，僅若蚱蜢。其實那時梁啓超式文學，雖風靡一時，而文體上確時有變易，——日漸淺顯，時有進步，國風報上的文字，已不是新民叢報的文字，新民叢報的文字，亦不是那時所流行的文字。思潮隨時代灌輸而來，不澈底的改良，當應有逐漸實行革命的一日。雖是林紓嚴復章士釗胡先驌等竭力還想保全殘喘生命，但潮流推移，擬古文的頹勢，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綁赴刑場死囚，最後的掙扎亦不過令一般革命的更勇敢地促其早歸天國。

整個的主因，大致不外如此，其爲這次運動中心的各個分子，却亦有更重要的關係。這次運動大本營，自然要數北大，而這次運動褓姆，則不能不推蔡孑民先生。蔡先生旣長北大以後，他鑒于北大學風，仍承襲京師學堂的官僚習氣，遽加改革罷，旣難得當局同情，亦必遭輿論嫉忌；但他是洞徹世界潮流的，一個全國最高學府，竟仍其腐朽態？心有不忍，亦辜負本身責任。他在這兩難之中，他竟想了一個最善的辦法，古文家劉師培黃侃請他，反對古文家的今文學家崔適也請他，頑固守舊辜鴻銘請他，邏輯著名的章士釗也請他，他認定了優勝劣敗的不易公律，不管你是新是舊，合到一塊，見個高下，自然適者生存。其實在他早已見到了文學革命的趨勢，所以把文科全權給陳獨秀。陳獨秀所辦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雜誌我們雖是不能說是他的示意，至少他是贊成的一個重要份子。所以他在答覆林紓反對北大提倡文學革命運動函中，大要說：

第一點——廢孔孟剷倫常。

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廢孔孟剷倫常教授學生乎？

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于學校以外發表其廢孔孟剷倫常之言論者乎？

第二點——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學

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

乙、白話是否果能達古書之義？

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文學，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可以見着他和藹的態度。

自蔡先生發表此函，難倒林紓後，一般守舊派，在北大方面才沒有再說什麼。林紓只好說：

知拉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林紓論古文之不當廢

「明知口衆我寡不必再辯」

「吾輩已老不能爲正是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均林紓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語）

一類話敷衍嚴幾道亦只有任旁邊說是：

⋯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挾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嚴幾道書札六十四載于學衡二十期）

當然，這次運動中，引動文學新舊爭論的，不能不數胡適的那篇文學改良芻議；但樹起革命旗幟的，我們也不能因爲偏向政治方面，而忘了陳獨秀。如果文學革命，不是僅僅來革文體而尙注重于思潮方面的話，陳獨秀在胡適未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前，他切切實實介紹過新的思潮：如「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現代文明史」「讚歌」「美國國歌亞美利加」「現代歐洲文藝史譚」「歐洲七女俠」「當代兩大科學家之思想」諸篇，他痛痛快快推倒舊的思想，如「敬告青年」「婦人觀」「今日之教育方針」「抵抗力」「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後之覺悟」「新青年」「我之愛國主義」「駁康有爲致總統書」「憲法與孔教」諸篇，他也比衡過中西新舊不同的關係，如「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等篇，這些當然不是就說具有改革文學的意義，但他至少貢獻許多文學上的思潮和運用的材料。我們就以接着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的一篇文學革命論說，他「高張「文學革

命軍」大旗，標着革命軍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三大主義」，「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爲之前驅」，對準「有肉無骨」，「有形無神」，所「目注心營」的「不越帝王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窮通利達」，「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以之較不澈底的改良論者胡適，尙嫌爲「矯枉過近」的八不主義，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倣古人。

八，不避俗語俗字。

（按此爲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民國六年……一年另六個月後才想出的確定主張。（民國七年七月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初只云八事─民國五年十月給陳獨秀函中的八事，是：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須言之有物。到了民國六年一月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改爲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

如何？胡適「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亦只認爲「不無討論之價值」。「欲引起國中人士之討論」，「徵集其意見，以收切磋研究之益」，尚不能決定『此事之是非，』而說『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又誠惶誠恐的說「已張革命之旗，雖

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爲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以之較：：改良中國文學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爲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倘有何種意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爲文學正宗者，猶之清初曆斥西法，乾嘉疇人傳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閒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復胡適函）

之深切的認識，及勇敢的精神爲何如？這豈僅『不慮所願』，實出『所願』之外，那種沒『有一試之價值』，猶疑畏縮的『嘗試主義』，還要去『告國中之有志于文學革命者，請大家來嘗試嘗試』的『已張革命旗幟』，革命者是這樣麼？胡適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搬出許多不正確沒有比例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來附會演進，附會革命，陳獨秀則只說：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

。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祗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答適之——討論科學與人生觀）

不錯；某種事實的存在，都是應着這個(時代)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胡適假使在三十年前不說革命，就要改良，也不過如譚嗣同這一般人，只是你說你的，有誰注意？時代過去，只是歷史上陳迹，要對準時代，方有存在的價值。提倡白話時代，已經過去好久了，胡適最近政論中，還在大談其白話的需要呢？

那時，間接直接有助于文學運動的除了蔡先生和陳獨秀外，在思想革新方面，有高一涵先生和吳虞，在深刻研究方面，有錢玄同劉復沈尹默，在實行寫譯方面有周作人魯迅兄弟，我們知道：思想革命起於革命之先，有思想革命而引起文學革命的，歐洲文藝復興，已是前例。高先生幾篇政治上革新主張，吳虞幾篇攻擊孔教的極端議論，（均見新青年）都未嘗不間接給文學革命助力。錢玄同在先他雖只是通信——其實胡適在先亦只是通訊，亦不過因陳獨秀文學變遷說引起主張，他們主張，實甚澈底，如陳丹崖指出『胡適既主張非古典不用陳套語』，「細讀胡君著作亦不盡脫離關係」，錢玄同反對『工者偶一用之，未爲不可』，及

「應用文改革十三事」（新青年三卷五號）而劉半農我之改良文學觀確定文學範圍，劃清文字與文學界限，改造新韻，以今語入曲，與主張分段加自選符號圈點等，遂趨具體化，幾千年來傳統的舊文學，本來已成僵尸，無能自立，至是遂宣告死刑，讓這具有新的形式新的意識的產兒——新文學，英挺而堅實的步調，邁進中國文壇走建設的大道上去。

（己）文學革命的影響

新文學運動的結束，在文學本身上說，是：

一、文學運用靈活。

二、文體解放平易。

三、思潮灌輸新穎。

三種。本來梁啓超式文字文體，「筆鋒常帶感情，」仍脫不了舊的格調，這次却完全擺脫古文的巢臼，散文方面，確少「無病呻吟」：詩的方面，不限用韻，流露真摯感情，小說方面，不拘回目，盡是「有什麼說什麼」，不憑理想，注重人生；戲劇方面，是離開個人幻想的

頹廢的歧途，而傾向於社會寫實的，極積的大道上去，顯然是中國文學史上劃了一個新的時代。其敍述力求淺顯通俗，而少晦澀。各文字文體中，均抱同一目標。

至於思潮方面，這當然不能不歸功門戶開放後之唯一的政績，使得一般人士，一面洗刷舊的酸氣，一面接受世界文學主潮，新文學的嬰兒，才算脫離了傳統的樊籠，而活潑潑地產生下來。自新文學產生以後，在這短促的時間，複雜的社會，自然不能有多大收穫，但各種思潮，各種流派，隨時產生，應有儘有，不能不說是這嬰兒所引來的效果。

文學革命的洪流雖是衝決了舊的文學圩堤，鄰及舊的文學圩堤的教育，也不得不連帶受了響影，而發生變化。過去的中國教育，雖是廢除科舉，而新科學式的學校，封建思想猶有相當保存。這次經了陳獨秀胡適一班人無意的「加上一鞭，」舊的畏懼而爭扎，半新半舊的也警惕起來，權衡之下，自然已陳敝的藍衫，很難得着人的注意，而西裝革履，青年爲好奇心所趨使，總得也想如胡適一樣的「嘗試」一下。所以新青年出版後，北大學生已自動的訓練，到了新舊正轟轟烈烈接觸的時候，他們略齊了陣線，搖旗吶喊——新潮雜誌，斜刺裏殺將出來。陳獨秀還接續訓練了一個基本軍隊——每週評論國民公報亦相繼起義，各校訂閱日多

，不曾振發起噴。乘之外患日深，外交看着失利，愛國學生，燃燒着熱血，於是組織團體，發行新聞，以淺顯的白話，寫自己的主張；社會上自覺者，乃亦出版雜誌，如星期評論建設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據當時的統計，大小刊物有四百餘種之多，教育界頓呈蓬勃勃生氣。學校裏作文，已一改了過去的方向，國語文類選白話文範都成爲最好教材，但思潮一如海潮，一經解放，萬馬奔騰，不可收拾，文體革命，隨着思潮上的革命，急速的佔過舊有的文學領土，青年學生已深刻了解在社會上的地位，對國家的責任，自治會，學生會，應運而生，振礫中外的五四運動，是其最顯着的表現，五卅運動亦接着前次餘下波浪，蹈後湧來。

在過去以文人參加政治運動的，以漢廷諸儒爭論，宋季諸生伏闕上書爲最顯着，清末康有爲聯絡十八省舉人公車上書，猶是餘浪。這次在政治意味上，倘亦相同，但影響所及，在國際上，固屬使帝國主義，未敢輕視我國民氣；在政體上則含有深刻的民族意味，民主主義的意識。結果，曹章陸，因以去職，而軍閥專橫，政客摧斷亦增加許多顧忌。固然這種運動，還是啓蒙時代，只是偏重破壞方面，很少建設，但以後各主義各思潮因以勃興，孫中山先

生民族革命，引起了許多方面革與助長文學革命，這次運動的波浪亦給以很大的助力，完成北伐。

談到社會，雖然很少直接看出具體表現，受這次運動影響，俱由學生運動，由學生領導民衆運動，社會上却起着很大變態。過去民衆只知道安居樂業，守本分是民衆自認的天職，什麼國家，什麼政治，他都不管。經過了這次運動以後，文字方面，是沒有以前那樣很深的界限，一望而知，那麼所受的知識，所得到的印像，自然明瞭而深刻。而出版物一天一天的加多，報紙的銷量，甚至鄉野小茶肆中亦多備一份，以爲談話的資料，這不是一個很切實的見證嗎？

總之，這次運動，辛亥革命後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辛亥革着政體，而封建思想深印民衆腦髓之中，則不易革除，這次革命，則將民衆僵死的局勢喚醒，大家都知向革新一條路走去。雖然不能說是怎樣健全，但這重大意義，是不容玩視的。不過胡適在這次功績簿上，則不能獨奪其功，不但不能獨奪其功，實所給我們的成績，亦至少有限。

（庚）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成就

究竟胡適在這次革命中的功績如何，我們當然不能全部抹殺，我們要明瞭經過，我們要洞察事實，我們要深探胡適最初的本心，我們要細看胡適所具的態度，我們再拿他的成就證實，那末很了然的可知他的身價了。

文學革命的前一幕，經過譚嗣同梁啓超等熱烈主張，效力和影響微小原故，自不外政治上壓制，環境上惡劣，思想上陳朽所致。的確，政治未經改革，環境未經刷清，思想未經洗滌的時候，任你具多大的魄力，多費些筆墨，想將一種傳統的舊有文學，整個推翻，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自覺，他們同時所以不能不從政治，社會，思想三方面入手，——由新民叢報到新青年都有一貫意味。

先說經過和事實。

今之說文學革命提倡的人，好像大家都爲胡適做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接着有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遂指胡適爲發動者，陳獨秀似乎是因着胡適一文，而引起的奮鬪。其實在胡適未發

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前，胡適先有一信致陳獨秀，內中所說改良八事亦正是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事，據信中所說：

……今日偶繙閱舊寄之貴報，重讀足下所論文學變遷之說，頗有鄙見，欲就大雅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此言是也。然貴報三號登謝先量君長律一首，附有記者按語，推爲「希世之音」：……細檢謝君此詩，至少凡用古典套語一百事……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正以足下論文學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而獨嘖嘖稱譽之此古典主義之詩，竊謂足下難免自相矛盾之誚矣。

是在胡給陳信之前，陳獨秀已經主張「古典主義之當廢」，當趨向寫實主義，有「文學改革的宏願」以引起他「年來思慮觀察所得」的「八事」。陳獨秀接受他的「指斥」，八事中除五八二項，其餘六事，無不合十贊嘆」。又「蒙」「海內外講求改革中國文學諸君，倘能發爲宏議，以資公同討論」。三個月後，「文學革命」，換爲「文學改良」的八事，於是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正式宣布，但係「芻議」，「猶云未定草」，尚須「伏維國人同志有

以匡正之」。第四號陳獨秀就接着文學革命一篇，「拖四十二生的大砲」，不過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了！不過說是說，做還未盡做到，第六號陳丹崖函中有

胡君說主張非古典不用陳套語，細讀胡君著作，亦不盡脫離關係，豈胡君「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灣含糊道去」（引胡君語）耶？

之譏誚，這是以胡適送給於陳獨秀的「自相矛盾」，煩陳丹崖再送給胡適，但是這啓蒙期所難免的事實，我們不能一定專責胡適。

「四十二生的大砲」，是「拖」出擺在陣前，幫着實彈描藥的，要算錢玄同劉半農。錢玄同第三卷第一號（民國六年三月）給陳獨秀信中雖贊成不用典外，但反對胡適「工者偶一爲之未爲不可」，謂其，「猶未免依違於俗論」，所謂「依違俗論」，是胡適文中（文學改良芻議）引江亢虎所說：

所謂典者亦有廣狹二義，餖飣獺祭，古人早懸爲厲禁；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則非謂文字之品格全失，卽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簡而涵義多，此

斷非用典不爲功。不用典非特不可作詩，並不可寫信，且不可演說。來函滿紙「舊雨」「虛懷」「治頭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獸」「發聾振聵」「負弩先驅」，「心悅誠服」「詞壇」「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鐵證」……皆典也。試盡扶而去之，代之俚語俚字，將成何說話？其用之繁簡猶其細焉。恐一易他詞，雖加倍蓰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處奈何？……

謂其，「甚中肯要」，而附和其「用字簡而涵意多」——即「典之工者」，並引五例；謂「皆以典代實，其妙處終在不失設譬比方之原意，惟爲文體所限，故譬喻變而爲代耳」。這大概江函所說，無詞可駁，有勉爲牽就的苦衷，但經錢玄同說：

（1）（3）（5）雖曰工切，亦是無謂……若（2）所舉之蘇詩，胡先生有「近於纖巧」之論。弟以爲蘇軾此種詞句，在不知文學之「斗方名士」讀之，必讚爲「詞令妙品」，其實索然無味，祇覺可厭，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舉江亢虎之誄文、胡先生稱其「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實不知其佳處。至如「未懸太白」一語，正犯胡先生所云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條。胡先生知「覇橋」，「陽關」，「蓴鱸」

爲古事之有所指，不可移用」則知護國軍本無所謂「太白旗」，彼時縱然殺了袁世凱，當不能用「梟首示衆」之舊例，則「懸太白」三字，無一合事實，非用典之拙者而何。

這是錢玄同激底革命的見解。此外他倘主張「戒絕人之稱謂」，如「湘鄉」，「合肥」，「南海」「新會」「項城」「黃陂」等；又「事物名稱，道古時事，自當從古；若道現代事，必當從今稱」。如「古稱冠、履、袷、裳、籩、豆、尊、鼎、」僅可用於道古，若道今事，必當改用「帽、鞋、領、袴、盤、盆、壺、鍋」諸名，好像是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的，「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的引子。

劉半農的我之改良文學觀（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是安定這「四十二生的大砲」座位，擇向相當距離，帶着指南針瞄準敵人的，不只是空空洞洞賊打賊殺的。他測定戰場範圍——文學之界說何如乎，他分別敵人與非敵人——文學與文字，他預定敵人被征服後怎樣安撫——散文之當改良者三，（第一破除迷信，第二文言白話可暫處於對待地位，第三不用不通之字）。韻文之當改良者三，（第一破壞舊韻，重造新韻，第二增多詩體，第三提高戲曲對於

文學上之位置。）這樣的戰陣和設計，總算給「衝鋒陷陣」的將軍，少走錯路。

同期，胡適函陳獨秀說：

> 適前著文學改良芻議之私意，不過欲引起國中人士之討論，徵集其意見，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爲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他並告可以成集之白話詞取放翁詩「嘗試成功自古無」之語，名曰嘗試集，嘗試者，即吾所謂試驗也，試驗了結果，今當不可知。……以白話嘗試主義，頗有一試之價值，亦望以此志告國中之有志於文學革命者，請大家各來嘗試嘗試！這是多麼小心，更其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他因

> 至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爲何物，則全係於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

遂從歷史上找些白話證據，想來「服古文家之心」，虧他有這些閒工夫。但陳獨秀在答他

函中則話：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爲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自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爲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尙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爲文學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閒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

此後胡適與錢玄同來往有幾封信討論，大都關於材料問題。惟第四卷第一號胡適答錢玄同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一信。內有一段「白話解」，「釋白話之義，約有三端」：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語。

（二）白話的「白」，是「淸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雜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幾個易曉的文言字眼。

但他又贊成錢玄同信中所說：

現在我們着手改革的初期，應該盡量用白話去做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捨去，那麼便不免存留舊污，於進行方面，很有阻礙。

「極有主張」，「極以這話爲然」。

經過一年多，胡適將八事改爲八不主義，而又統括作四條：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語俗字」的變相。

而有「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他「從文學方面着想」，從「國語方面着想」，想着這個「根本主張」，並「實行做到這個根本主張，應該怎樣進行」？「進行次序」，「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辦法。

「工具」預備的方法：（一）多讀模範白話文學，（二）用白話作各種文學。「方法」有三類：（一）收集材料方法——推廣材料的區域，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二）結構的方法——剪裁布局。（三）描寫的方法——寫人，寫境，寫事，寫情。並時說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一）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二）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創造」他「不配開口」，他說：

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經過和事實，（只說與胡適關係者其反對方面從略）大概說到此處為止，後來雖是還有幾篇討論文字不大重要，現在再談胡適的最初本心和所具的態度。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

以上所言，或有過激之處，然心所謂是，不敢不言。

此一問題關係甚大，當有直言不諱之討論，始可定是非。（以上為給陳獨秀信）

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究，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以上為文學改良芻議語）

這是多麼有「眼光識力」有「筆力」的言論。假設不是一年多的「再四研思」，再談還是「八事」，三說仍是八事又變做「八不主義」的話，「文學革命家」的頭銜，我無論如何，也要隨着衆人一樣的稱呼他。可是「短毛細身，遮不着猢猻尾把」，一般人是被騙了。

他真是「憂慮觀察所得」嗎？真是「心所謂是」嗎？真是「可定是非」嗎？真是「再四研究」嗎？看他說「嘗謂」「嘗謂」「年來」「年來」，似乎不是騙人。但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我現在拿實驗主義的方法，我可斷定這種，「思慮觀察」，這種「研究」，是外在的，不是內心的，是「是」人之「是」，「非」人之「非」的，我們看「證據」罷。

給陳獨秀信中「以或可——當有不可意義含在其中——供當世人士之討論」，因「足下（指陳）洞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想「乞」「賜以論斷」的。陳的答

覆呢？「論斷」是「何敢何敢」，所「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其餘六事無不合十贊嘆」。以爲「今日中國文界之字音」。「倘能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爲一文，以告當世，其業更盛」，「阿彌陀佛」，香音菩薩着「幸得西方佛爺還杪，合十贊嘆」，於是，「再四研究」了，向「友朋辯論」了，又「包括所懷見解」，將「革命」的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言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上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八事，變爲「改良」的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八事，並「分別言之，」又恐怕「矯枉過正，」（實在後八事與前八事無「矯」無「正」）、很虛心的「伏惟國人同志，（這是不摹倣古人，務去「爛調套語」的新「調」「語」）有以匡糾是正之」。「謂之芻議，猶云未定草也」，那末已經不是「心所謂是」了。

適去秋與友人討論文學，頗受攻擊，一時感奮，自誓三年之內，專作白話詩詞。

他做白話詩詞動機是這樣，文學改良芻議中「輔以友朋辯論」，大概也不外受着「攻擊」而興奮罷！但我們知道「興奮」只是一時意氣，沒有精密思維，沒有深刻認識。興奮後的「思想觀察所得」，「其結果所得」，「所憬見解」。是帶有主觀的。難怪陳獨秀擁着他的「意旨」「直言不諱討論，」斷「定是非」「抱着四十二生的大砲」走上「前」去，「與十八妖魔宣戰」了。錢玄同也助上幾顆手溜彈，碰碰碰……的開始瞄對敵人了。他却倒背了槍，站在遠遠地說：

適前所著「文學改良芻議」之私意，不過欲引起國中人士之討論，徵集其意見，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

原來他是受了「攻擊」，「一時感奮」，自己賭過咒（自誓），「私意不過」「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個人主義觀的胡適，看了革命的陳獨秀錢玄同這樣的實行真幹起來了，恐怕戰雲瀰漫起來，「效果」「倘不可知，」有礙凹國前程，又很從容很冠冕的喊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

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旣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爲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鳴號收軍』罷！太魯莽了——本『平心靜氣』，我大博士還未來『實驗』呢？

……專作白話詩詞……因取放翁詩「嘗試成功自古無」之語，名之曰「嘗試集」。嘗試者，卽吾所謂實地試驗也。試驗之效果，今倘不可知，本不欲遽以之問世。所不憚爲足下言之者，以自信此嘗試主義頗有一試之價值，亦望足下以此意，告國中之有志於文學革命者，請大家齊來嘗試嘗試耳。

『年來』『年來』『嘗謂』『嘗謂』而且『積思于數年』（再看陳獨秀與錢玄同）這是『一朝一夕』嗎？旣說「或有過徹之處」，容有『矯枉過正之處』未「平心靜氣過」嗎？「試驗之效果」「不可知」，怎知有『頗有討論之價值？』到那一年才有「效果」？怎樣使「大家齊來嘗試嘗試」？我想中日假設將來開戰，請胡適來先『試驗』一下，看看「效果」，亦是一個「臨陣脫逃」，「畏首畏尾」的好辦法。不過「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日本人可「容」你「試驗」可「容」「大家齊來嘗試嘗試」？這個「是非」何時可「定」？難道說如八

事中「不用典」又要「用之二者」，那樣不『是』不『非』嗎？到要胡適『思慮觀察』「研思」，「再四研思」，不要厚着臉皮勉強說「我們已張革命之旗」這樣試探，猶疑的態度，先覺你革去什麼來？

不過陳獨秀他已領了帥印，錢玄同已做了先鋒：

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

眞「不容退縮」，也不能『退縮』了。孫行者有七十二變，張天師會『捉妖打鬼』，他能在故紙堆中——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尋出許多不健全的證據，好像是說：『他們是這樣，不是我要這樣』。

歷史上的文學，被他尋出來了；國語的文學，被他建設起來了，但，

至于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爲何物，則全係于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歷史的文學概念觀）

『創造』…… 我可不配開口了。

我以爲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建設的文學革命記）

『今日之文學』『爲何物』，不能『料』，不能『創造』，連『實行預備創造』的『地步』，還是『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還是「儘可不必」，「這種把握不着時代，把握不着思潮，還『配開口』，「談」文學革命？難怪一下「革命」，一下「改良」，一下「革命」，又一下「改革」呢！

總之：胡適在文學革命方面說：他的

動機：是感奮的不是認識的；

態度：是猶疑的不是徹底的；

企圖：是機會的不是決心的；

對象：是個人的不是文化的；

目的：是嘗試的不是實行的；

成功：是僥倖的不是奮鬥的。

然而陳獨秀不幸迷入歧途，這次功績竟被胡適獨奪過去，胡適也自居不斷了！

拿胡適的成就來證實罷：

說到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成就，自不能不分着：

(一)主張方面

(二)提倡方面

(三)介紹方面

(四)整理方面

說，除另有專章詳細討論外，我們可擇其言論重要的逐次說下去。

(一)主張方面

自民國六年一月一日新青年二卷五號文學改良芻議起至七年四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四號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止，中間夾着一篇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年四個月中，胡適的一貫主張，爲雜湊的八事或八不主義。

說到「八不」內容，一看到前面不憚煩瑣的所說過去文學革命幾次運動，似乎前人都已

主張過，對較一下，自可看出，這裏也不必再說。不過在同這時代中，在胡適未說這八事或八不主義以前，有幾個人已說了許多話，而未引起人家注意的，這裏先略說一說。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曾毅給陳獨秀函，曾將他所「纂輯的文學史」的見解，因同于陳獨秀和胡適「所主張者」特鈔結論一節，以相「質證」。曾毅所著文學史由現在的泰東書局出版的修正中國文學史弁言內說，是成於民國四年，比胡適在時間上說是，要早一二年，就結論中所說：

第一中國之文，壞於用意摹倣，

第二中國之文，尤壞於濫用典故，

意義是要

貴於通達，以適時用；

文出乎學，而要乎用。

蓋，

文主通俗……以為先取其通曉者連入之，凡不能代以俗語者，必力求其淺顯，如避

能而用克，舍其而用厥，舍何而用曷，避熟語而用生字，皆大可不必也。

這與胡適後一二年所說的八不主義，第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第三「不用典」，第七「不摹倣古人，」第八「不避俗語俗字」，是完全相同。不做「言之無物文字」，當然不會去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不摹倣古人」，第四「不用套語爛調」，第五「不重對仗，」——文須廢駢，詩須廢律，似可不必說，已經含了「不」字「廢」字在內。第六項「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當然不會是桐城派聲色格律的格律，必是倣傚西洋文法而言，那末馬建忠早有馬氏文通，梁啓超亦是老早有這種主張，馬氏文通的「通」，「不通」，是另一問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對於這一項，一則說：

其例至繁，不便舉之，

再則說：

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要說「明」呢？在八不主義中，前代早有「明」之，當時亦很多「明」之的。「詳論」要「無待」，都可「無待」，不過八不之中文法，雖說「至明」亦「至難」，——明，易也。難

爲易的對待。前無所據，後無所立，我們不能說「明」了，就可算事，我們要「明」了怎麼辦？馬氏費了多年心血，一部文通尙疵漏百出，胡適多年「研思」，「不幸得很」，兩萬多字國語文法概論，是繼馬氏文通「古文文法」，而另立一「國語的文法」。馬氏「缺乏歷史進化的的觀念」，「把文法的條例，錯認作『一成之律，歷千古而無或稍變』」，胡適看到「從論語到韓愈，中國文法已經過很多的變遷了；從論語到現在，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多少的大改革」：我們應慶「幸」胡適是怎樣將「很多變遷」，「多少的改革」，拿「歷史進化的觀念」，成一部文法變遷改革史。「但他的裏面，還有許多很難說明的條例」，「且舉幾個很淺的例，」就算完了這部工作了。而「莫我知」和「沒有人知道」，「不汝貸」，和「不饒你」「莫之聞」「莫之見」和「沒人聽過他，也沒人見過他」，「這樣一改」，只是「一改」呀」「很多」「多少」，在那裏呢？又「明」什麼呢？

但胡適做的是國語文法概論我也把它拉扯遠了：罪過！罪過！這篇概論，第一篇「國語與國語文法」，應該比較的：第二篇「國語的進化」，應該敘述的——是不是，另一問題。第三篇「文法的研究法」，尤其應該指導研究國語門徑的。我們想到國語文法概論的題目，

在第三篇剛要讀完的時候，我們以爲胡適在第一篇第一段三十幾個文字卽提到的「什麼是國語的文法」，現在一定繼續出現給我們作國語依據了。但「不幸」，大「不幸」，「研究文法的三種方法完了」，國語文法概論也完了，什麼是古文的文法」？我們免强可以拿馬建忠的文通，「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文通後序）幾個條例，答覆這問題；「什麼是國語文法」？我們可以拿國語文法概論中「國語與國語文法」答呢？拿「國語的進化」答呢？還是拿「文法的研究法」答呢？「什麼是國語的文法」？到底什麼是「國語的文法」呢？

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這種「議」，「論」，是有淵源的：

一、因「重讀」陳獨秀「所論文學變遷之說」，遂有「八事入手」的主張——五年十月給陳獨秀信。

二、因陳獨秀復語「倘能發爲宏議，以資共同討論」，遂「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而有「文學改良芻議」的「結果」。

三、因陳獨秀「絕對」「主張」，「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正宗」，遂被他尋出歷史

的文學概念論。

四、因陳獨秀「語求近於文，文求近於語」——六年四月答曾毅又十月答錢玄同，作「文求近於語，語求近於文」遂想起了「國語的文學　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只要是有新青年在手邊頭的人，從他們所討論的經過文字，一看線索，是很清楚的。但「八不主義」，最後又「總括作四條」：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據說「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但那是積極？怎樣積極？被他「一筆表過」「建設」罷！

「建設新文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也無非前人所說的「語文一致」或「語求近於文文求近於語，」這且不管他，在這篇裏說文言怎樣的死，白話怎樣的活，一節，二節，三節這樣的說過去，四節說「應該怎樣進行」分着（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三步」，說

前兩步是預備，第三步才是實行創造新文學。

「工具」，「方法」說過，是臨到創造了，看他說罷：

至於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真是奇論，第一第二兩步，是預備的工夫，不是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嗎？胡適承認「國語是古文慢慢演化出來」，那末當然隨時可以「創造」，不談創造罷？連「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還說不必「空談」「努力」「努力」「努力」了幾年，到半部白話文學史也還是沒有「方法」和「手段」出現，「創造」更不必談了。——只有魯迅錢玄同那般人，不僅「空談」「方法」和「手段」，還要去「創造」，該死，該死，同古文的死一樣的死。

(二)提倡方面

(甲)文學

創造，胡適既是「不配開口」，但在民國八年居然「創造」了「一個問題」，只能說是一個問題，要說是小說，我們却不能像胡適在論短篇小說論中所說的「充分滿意」。好在同年九月胡適在短篇小說第一集——是永久的第一集自序內說過。

可惜我不能創作，

我們可不說它。在他「論」的方面，胡適是

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人，

並做了一篇論短篇小說，將短篇小說界限分出，將中國短篇小說略史敍出，結論並要教

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賬，竟不懂狀物寫情，是全篇瑣屑目節。

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

，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

「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眞正的短篇小說」。短篇小說，的確是經濟，但說：

（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

（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之關係，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經濟的方法。

「兩種原因」並以爲

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最經濟的」體裁。

實含有絕大的錯誤。文學經濟是一問題，短篇小說是一問題，文學經濟，只能在文學本身上說，不能卽用到短篇小說身上。世界小說，雖有注重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的，「都有」固不盡然，長詩，複幕劇，長篇小說，還在繼續創作的卻很多。而且短篇小說，與長篇

小說，各有各的意義，各有各的價值，照胡適所說的「原因」，長篇小說是必因其「因」而將歸消滅，但在我想却因胡適第一「因」，而有長篇小說永久存在的必要。「世界的生活競爭，「天忙似一天」，當然一天要複雜一天，以複雜的世界，複雜的生活，不是短篇小說所能盡情描致，局部寫出的，——並不僅像九尾龜一類的東西。以胡適所提倡的紅樓夢水滸等小說說，任你是具何等經濟手腕，不是短篇小說所能辦到的事。要把它分開敍述，寫成經濟的短篇，它的意義和價值却有不同。他自己很不經濟的「做了四五萬字的考證」，「不愛惜精神與時間」，却爲何來？自己所自認，「花了這點精力與目力是很值得的」，却又何說

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

假設「性相近」寫長篇小說，如胡適「性近」考證一樣，爲什麼不可「揀選」。胡適不是，

吃了飯沒事的老爺太太。

又爲什麼不「經濟」的去做考證，去要人家不「經濟」的，看這不「經濟」的長篇小說？而且斯賓塞所說，係指文章本身說，胡適硬拉到短說身上來，在胡適便利自己說到很「經濟」，累我說出許多字來，實不「經濟」。「九尾龜」類的小說」「不知道」「體裁佈局」，可

以概括其他長篇小說，我拿此處胡適的錯誤見解，也概其他所說的這樣錯誤，總有些說不過去罷。

就考證方面說：

關於考證方面，胡適的確做了一番　勤的工作。水滸傳前考後考做了四五萬字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序，又做了兩萬多字，西遊記考證兩萬多字，鏡花緣引論一萬多字，水滸續傳序三國志序三俠五義序海上花列傳序兒女英雄傳序官場現形記序老殘遊記序等各數千字，尤其以紅樓夢考證最爲着力。民國十年十月考了兩萬多字，頗引起一般研究者興趣，商確討論，盛極一時，於是十一年五月，有跋紅樓夢考證，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到十七年，還有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序，並考證些新材料。自然，承了清代考證方法以後，受了西洋洗禮，又有豐富的圖書館供給材料，只要你肯花費些時間，多貫注些精力的話，用力還較讀書雜誌經傳釋詞爲易，而方法却比金聖嘆等爲高，王國維先生雖是早幾年就看到紅樓夢的作者，需要考出，胡適總算不負王先生所欲，而且亞東書局的紅樓夢小說一類，經過標點，經過胡適作序，有銷至十數版的，這我們不能不拜賜先賢提倡之功，胡適繼承擴大精深之志，而予一般人

以特別注意了。

新詩是胡適因「感舊」「自誓」「實地試驗」過的，並「自信此嘗試主義，頗有一試之價值」。嘗試集自序所說，他自己文學革命小史，因爲並沒有人像胡適一樣能夠找出「證據」，自然「都是實在情形」。嘗試集詩我不必說什麼，「美洲的朋友嫌太俗」也好，「北京朋友嫌太文」也好；胡先驌差不多費了一月工夫，兩萬幾千字論難，固是白費；說他是新詩的軌範，亦殊不忍。詩的內容外形，都經過以前的文學分子革過一番　不再說。但胡適之學的態度，革命的精神，嘗試的行爲，實在有些不敢附和。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爲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
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
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媿，
即使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
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
來嘗試。

這完全是狡猾之語，欺人之譚，「藥賈嘗百草」，「名醫試丹藥」，是抱着固定的主張，堅卓不拔的精神，一貫做去。藥性不同，藥味不對，可以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以使人「脚力莫枉費」，新詩是那時一般人的共同趨向，共同主張，不因胡適一人「嘗試」「成功」而相從，也不因胡適一人「嘗試」「失敗」而拋棄；且所謂「成功」「失敗」就詩的本身上說，簡直無所謂，個人更不必說。「作詩」做事要如此，詩要失敗如嘗了毒藥，可以不要做，事要失敗可不必作，難怪「嘗嘗」了「好人政府」滋味後，官迷未醒，才感覺「行亦不易」呢？

戲劇方面，在民國六年五月寫給陳獨秀信是這樣說：

論戲劇一節，適他日更有戲劇改良私議一文詳論之。

一年多來，大概一般人看到了趨勢，如傅斯年做的戲劇改良各面觀，歐陽予倩的予之改良戲劇觀，張厚載的我的中國舊戲觀等。搶了胡適的先，但胡適畢竟是不肯讓人的，他看了「這許多文章心癢手癢」，他就「劃出戲劇改良問題的一部分」，做「題目」，「叫做文學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胡適是有家學的，歷史方面的考察，是他拿手的好劇，有了歷史的文

學觀念論，再演爲文學進化觀念，這是應有的，拿文學進化觀念來證戲劇之應加改良，亦是必要的。但可惜文學進化觀念所列四層意義裏面，除了第二層二種進步，一大改革外，其他與戲劇都很少關連。後面「兩種極淺近的益處」，「經濟方法」，自然是文學要律的一種，「悲劇的觀念」，世界文學領域並未佔有全部分，悲劇固「能發生各種思力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烈，發人猛省的文學」，然易「使個人銷磨志氣，墮落人格，陷入罪惡不能自脫」。喜劇的意味，自然不必像續石頭記後紅樓圓夢，南桃花扇漁樵記爛柯山等，畫蛇添足。但像現在平劇中，紅鬃烈馬，玉堂春等，使人發奮努力，不墜其志，感恩圖報，得還所願，亦是快心之舉。我贊成「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湯」」，但我希望不要忘了本身的體質，是否對症？要是隨便不問症之適合與否，濫「吃外國藥」，那末我只還敬胡適一個，哼！

（乙）國學

胡適是家學淵源，當然對於所謂「國故學」有些像樣，最初我們看到胡適對於國故學下判斷的，是答毛子水內說：

國故學的性質，不外乎要懂得國故，這是人類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

又說：

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我們應該盡力指導國故家用科學的研究法，去做國故的研究，不當先存「有用無用」的成見，致生出許多無謂的意見。

他「以為」「做學問」的「觀念」，是：

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揀定之後，當有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

「為真理而求真理」，已不是「要懂得國故」「這是人類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懂得國故，」是不是僅是「人類求知的天性所要求」呢？胡適為什麼治中國哲學史？答是要「懂得國故」，答是「人類求知的天性所要求」，這個答覆，不是滑天下之稽嗎？然而這不能算是胡適對於國故學或國學正式的理論，因為他只是答語。

北大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在大體上說，不能不說是較過去對於國學見解的有些進步。他算出明清三百年的三大成績：

（一）整理古書

（二）發現古書

（三）發現古物

他發現「那些」「三層」「缺點」：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

他「借鑑於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他「決定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應該注意」的三點：

（一）擴大研究的範圍；

（二）注意系統的整理；

（三）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

前二段所引，是他對三百年的國學考察，我們且不管；這裏「三點」中他對於國學的主張，並且最後結論，「提出這三個方向」「做」「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幫助國學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要「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這裏不能說胡適所「提出」的一定錯，不過有些地方，胡適見解是不健全。

第一擴大研究範圍方面：說是

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

文說：

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是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這樣擴充，在書本上的，固可說是擴無可擴，要在整個國故上，拿所謂「歷史眼光」說，般

契周金漢玉宋瓷……這些實物，你總不能把它摒除在文化歷史以外。而且照胡適理想中的系統：

中國文化史：

（一）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史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五）國際交通史
（六）思想學術史
（七）宗教史
（八）文藝史
（九）風俗史
（十）制度史

亦很有疏漏。如工業，農業，商業，社會運動以及天文，地理，醫學，數學等，在歷史上在文化史，都不可遺棄的，都與國故有關的，而胡適竟未講到！

第二注意系統的整理方面：胡適說：

歷史家須要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

一是精密的功力；

一是高遠的想像力。

「精密的功力」，不僅歷史家要如此，仍何專家，皆應如此；不過歷史是注重史實的，「高遠的想像力」，運應到歷史上面去，是要發生危險的。而且憑「想像力」構造「系統」，這個「系統」，各憑各的「想像」，各成各的「系統」，是永久不系不統的。

第三博采參攷比較的資料：這裏面胡適是說過，

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

如

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即是十字架……

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

然中國哲學史大綱裏以墨家與實用主義相提並論，要是胡適不是如一班「淺陋」一樣，不是「附會」，而是比較的話，墨家是何時代產生？實用主義是何時代的象徵？但可比較過？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學的自然法」，如果他也照樣「附會」，他可拿什麼証據比較過？這些說他是「附會」，他不承認，說他是比較，他實「附會」。比較是必要的，比較而沒有根本的方法，還不是附會之附會！

在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裏胡適「借」段玉裁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

「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說：

整理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

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他們的是非，則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是的，整理國故，要「還他們的本來面目」，要「評判他們的是非」。但，「還」了「他們本來面目」「評判」他們「是非」；整理國故的責任，就算盡了嗎？胡適在未有另具答案的時候，當然必同說一聲，曰：「然」。不過；我們曉得一國的國故，象胡適所說的一切文化歷史，僅僅把各個的「面目」「還」了，「是非」「判」了，決不能說是盡了整理國故的全責。譬如殷契周金漢玉宋瓷，「還」了「面目」，「判」定「是非」，還要考察它在歷史上意義，詳核它在時代上的價值，它與其它的關連，它以前和以後的淵源，聯繫它們，貫串它們，作一系統的敍述，才算整理完備。不然只要將各個的「還」了「面目」，「判」定「是非」，它們還是它們，與整個國學發生不了多大意義。猶之蓋造房屋，將各項材料，搜集到了，選擇好了，沒有一個計劃，把它建立起來，當然不能說我已蓋好房子。

整理國故與打鬼裏面說「

這回到巴黎倫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據款結案」的證據，可以把達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給打出來。據款結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

這是整理國故的目的和功用，這是整理國故的好結果。

「鬼」「打」跑了，「妖」「捉」住了，當然變成「人」的世界或「神」的世界了；但人只是人，人如不能在世界作有意義的活動，這種人何用？神只是神，神如不能威靈赫赫，要這神作甚？將「功用」作「目的」，將「經過」作「結果」這不是「打鬼」「捉妖」，這只是見「鬼」見「妖」！

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眞相，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的人都可以明白。

這太費心了！但實不「光明」，只是「臭腐」，只是「平常」，只是「凡庸」，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個「價值」也不過在歷史上多一個王念孫王引之一類人罷了。談到整理，還要到江西老表家裏去一趟，拜請張天師，多得些符法，再來「試驗」靈不靈。但胡適是要「不

過如此」，亦只好「如此」，「把戲千萬般」，原來「說破了「也不過如此」！」

(三)介紹方面

(甲)實驗主義

胡適所談的實驗主義，對於實驗主義本身既未認識清楚，與實驗主義相近的實用主義實際主義，又被他混用，拾了杜威的吐棄，大吹大擂，只不過穿了一件破西裝，後有評論，此略。

(乙)科學方法

在胡適文存第一集自序裏，我們看到胡適這樣說：

我這幾年來做的講學文章，範圍好像很雜亂——從墨子小取篇到紅樓夢——目的卻很簡單。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故這些文章，無論是講實驗主義，是考證小說，是研究一個字的文法，都可說是方法論的文章。

他是多麼看重方法呵！方法是怎樣呢？我的路歧上說：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應用。我的惟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方法。

而對於「科學方法」說是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治學的文法與材料）

「科學的態度」說是：

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走。

「只是一據話」，

拿證據來。

是他的方法，是「實驗主義態度的運用」，「實驗主義的新的方法」，是「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科學方法」也是「尊重事實尊重實證」，是「實驗主義的新的方法」，即是「科學方法」；「科學的態度」也是「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走」的，那末可以說，是三體一元論的方法！

他還把「證」字解釋一下說：

「證」這個觀念，本是一個法律上的觀念。法庭審案，必須人證與物證。考證古書，研究科學，其實與法官斷案同一方法。（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並引陳第毛詩古音考上的本證，旁證的解釋說，

顧氏完全採用陳第的方法（仝上）

曾說

這樣用證據，來考訂古書……這便是科學的治學方法。（仝上）

並在戴震裏把第二項訓詁學以為，亦是

用科學的方法，客觀的證據，考定古書文字的意義。（仝上）

難怪「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態度」「很簡單，」「只有一句話」呢？原來僅僅拿了證據，去考訂古書的顧炎武戴東原這些人，都是用科學方法的！

但還有

幾個最精密的長例，來表示漢學家科學方法。（仝上）

于是學了錢大昕，古音學「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的例，學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兩人訓詁學「虛字」的例，再學校勘學，根據和評判兩層的例，並將「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分爲「兩點」：

（一）大膽的假設，

（二）小心的求證。

這到奇了！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裏，開始卽說：

研究歐洲學術的人，知道科學方法，不是專講方法論的，哲學所發明的，是實驗室裏的科學家所發明的；不是亞里士多德倍根彌爾一般人提倡出來的，是格利賴牛敦勃萊斯來一般人試行出來。

以

世人所推爲歸納論理的始祖的倍根

倘

不過曾提倡知識的實用，和事實的重要，

証

略帶着科學的精神，……不能當「科學方法」的尊號。

而我們貴國這班老先生「既未到過「實驗室」」，也未「試行」過，他們居然能夠得着「科學方法的尊號」？胡適御封的這「尊號」，不但是爲祖國爭榮，且爲他們地下增光，倒是大幸」？可是事實是這樣告訴我們，證據不過是科學方法的佐證，在佐證之先有思維，繼佐證以後的有推論，「證」誠如法官審案，但爲什麼要「證」？證有了怎樣？不能說有「證」即是「判案」的終結？佐證不就是科學方法，科學方法也並是只「拿證據來」！這是胡適的一不通。清代學者的研究方法，充其量不過是歸納法，歸納法亦只是科學方法一種，不能即算科學方法——後而雖是引了戴震自己以爲是假設的一個「光」字的例，是否且不管，而胡適說：

假使這個光字的古本作橫，已無法證實了，難道戴震就不敢下那個假設嗎？我可以斷定他，仍是要提出這個假設的。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可以「斷定」？自己處處要叫人「拿證據來」，這個「斷言」不知拿出什麼「證據來」？這是胡適二不通。證據方面引了許多例，假設只是引這一個例，就可以「斷定」這不是犯了科學上孤證嗎？這是三不通。即認爲清代學者是具了這二種方法，這二種是不是

就是整個的科學方法呢？這是胡適的四不通，即就事實說，不想客觀的論斷，事實自事實，與科學方法何干？他還說

舉的例不多，便是類推的證法；舉的例多了，便是正當的歸納法了。（清代學者的方法）

怎樣的算不多？怎樣的算多？類推與歸納，是這樣多不多差別嗎？我不是「研究歐洲學術史的人」，我很願知道「研究」過「歐洲學術史」的胡適，將「知道」的「科學方法」來告訴我們，那知我們祖傳──清代學者有的是！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牛頓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築在證據上。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柏斯德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治學方法與材料）「結果」的不同，僅僅是由於「材料」「材料」嗎？那末考證法，非待先和「科學方法」攜家不可？還待何說！

(四)整理方面

整理方面如

中國哲學史大綱

白話文學史

章實齋年譜

吳敬梓年譜

戴東原哲學

淮南王書

以後都要把它詳細的分析解剖此處從略

總之胡適在文學革命中所有的成就

主張方面：是

雜湊的八不主義；

不明的國語文法。

提倡方面：是

不配開口的文學；

見妖見鬼的醫學。

介紹方面：是

穿着破西裝的實驗主義；

跟着證據走的科學方法。

整理方面：是

無頭無尾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不死不活的白話文學史；

慚愧出來的兩部名人年譜；

——章實齋和吳敬梓——

堆積起來的兩部哲學研究。

——戴東原哲學和淮南王書——

讀過上頭的文字，這樣擬的結論，大概也不致怎樣的冤枉他。然多從零星文字中尋出來，我

們希望他成爲著作的幾部書——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章實齋年譜，戴東原哲學，淮南王書，和幾種具體的主張——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實驗主義，知行問題，人權論，再去檢討着看。

二　中國哲學史大綱估價

(一)引言

這部書如果要認為是中國哲學史「開山」的話呢，那末蔡子民先生敍言裏說：

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

那也未嘗不可。不過胡適是說「它的功用，要使中國哲學史變色」的，我們就不能不檢查出來，它「變」的是什麼一個模樣兒。

誠然：

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

他是　治中國哲學開山的人，

他能　使中國哲學史變色，

在他個人看，何嘗不是「幸」？但貧困的中國學術界，喝過西洋水的人也有，熟讀十三經，廿四史，諸子百家的也有，胡適竟是「開山」的人了！「山」是被他「開」了，哲學史上，真個「變色」了，但不「幸」的很，「開」出來仍然一堆垃圾！

現在我們要估量這部爲中國哲學史變色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我依着大綱內容性質，把它分着

（一）編著中國哲學史的各問題；

（二）中國哲學的起源與古代哲學的中絕；

（三）先秦諸子哲學，

三步來說：

(一)編著中國哲學史的各問題

（甲）方法問題

胡適在「打鬼」的時候，給浩徐信中有這幾句話：

西瀅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西瀅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他是多麼自信，他的方法和態度——他是什麼「方法」呢？

我的理想中，以爲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國哲學史，必須要用這幾條方法：

第一步須搜集史料；

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眞假；

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除去不用；

第四步須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

先把本子校勘完好；

次把字句解釋明白；

最後又把各家的書，貫串領會，使一家一家的學說，都成有條理有統系的哲學。

做到這個地位，方纔做到「述學」兩個字。然後還須：

把各家的學說攏統研究一番；

依時代的先後；

看他們傳授的淵源；

二　交互的影響；

變遷的次序，

這便叫做「明變」。然後研究

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原故；

這便叫做「求因」。然後用

完全中立的眼光；

歷史的觀念，

一一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

再用這種種的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

這便叫做「評判」。

並申明說是：

這是我理想中的中國哲學史，我自己深知道當此初次嘗試的時代，我這部書，定有許多未能做到這個目的，和未能謹守這些方法之處。所以我特地把這些做哲史的方法，詳細寫出：一來呢，我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二來呢，我更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

他這部書

有許多未能做到這個目的，和未能謹守這些方法之處，

自然後面還要遵他所說，

用這些方法，來評判他（原句是我字）的書；

至他

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碻的中國哲學史，

而且「可以斷言」

不能用這些方法和態度……休想站得住，

我們到不必要捧出馮友蘭等所著中國哲學史，未用他的方法，討論「站得住」「站不住」問題，多費紙墨，我們這裏先要檢討他自己的方法，到底「站得住」「站不住」？

在這部書出版以後，梁啓超評他有

銳敏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與創造力；

許他爲

不廢江河萬古流

的，「空前創作」。並說：

專從實驗主義方向提倡，

係

「救濟良藥。」——「並見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

其實他的絕大錯誤，正是這實驗主義在那兒作祟，「述學」如此，「明變」如此，「求因」如此，「評判」亦如此，以致各篇各章，大都如此。不信嗎？說出來看罷：

「史料」問題要在下節詳說，此處暫且擱下，把「可信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假設像胡適鑒定清代樸學如王念孫王引之俞樾戴震等，已是具了九十九成的科學方法的話，那末除把本子校勘完好，把字內解釋明白，只要加一成把名家的書「貫串領會」，便成爲十足的科學方法。不過，時代不容許我們留住幾十年，要是在王念孫那一班人的時代，這種「述學」，自較王念孫那些勝了好多，可是時代已經跑過去好多年，有許多方面的學說指示，我們還精審本本身的完好，和主觀的明白，貫串領會，是決不會能夠整理出來一部所謂完備「精確」的書來。老子的學說，有些是仗莊子韓非淮南王書中所說，來說明；荀子的學說，有些是要拿那時社會經濟……來反證。管子商子雖是僞書，但內中表現法家思想地方很多，不能會之不說，死書本子可以看出點一家一家的學說，死書本子以外，也得運用相關的書籍，實物——如殷契周金，以及時代背景等相參證，這是胡適的「述學」方法應糾正者一。

「明變」固然要知道他們

傳授的淵源，

交互的影響；

變遷的次序。

並且據說：

哲學史第一要務，在于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學說，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稱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學，並不是孔子的儒學，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學，但是這個不同之中，卻也有個相同的所在，又有個一線相承的所在，這個同異沿革的線索，非有哲學史不能明白寫出來。

一種思想沿革變遷不是從思想本身上，可以「明」得來的。例如：所舉的孟子，荀子和宋儒明儒能，只是從他們本身思想上着眼，那所「明」的，一定不會「明」。他們的「同」「不同」是各有各的時代，孟子荀子同是一線相承孔子的，而所以不同者，即是他的背景不同。僅在思想本身上得着同異沿革的線索，仍只是在清代樸學的治學方法中去兜圈子，這是明變

的方法應指正者二●

「求因」說是：

哲學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還須要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學，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學，陸象山王陽明的哲學，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這些原因，約有三種：

甲，個人才性不同；

乙，所處的時勢不同；

丙，所受的學術思想不同●

個人的才性，確實是不相同的，然而，「要尋出」「哲學思想變遷的原因」，不從社會着眼，歸之于「個人才性」，似乎有點本末倒置●時勢與哲學思想變遷的原因，當然不無關係，但是要照胡適在問題與主義中所說的

時勢情形，便是病症；而學說便是醫生的脈案與藥方，

這話却不盡然●一種哲學思想，它的變遷，它的不同，頂多只能說是一種時勢的反映，要將

哲學認爲是一種「藥方」，覺能醫時勢的病症，試問莊子「破斗折衡」，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種藥方？胡適的實驗哲學，又能醫什麼時勢的病症？所受的學術思想不同，以致哲學不同，看去好像很對，實地考察起來，大大不然。孟子荀子同受儒學，而有性善性惡不同，韓非李斯同受學于儒，而入法家，即以孔門弟子論，所受相同，所發哲學思潮，不盡相同。但胡適要說是可以歸之于「個人才性」，那末「個人才性」有說不過去，又可歸之于「時勢」，這種求因法，求來求去，難怪在哲學史開始所求的四種

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

二、社會階級漸歸消滅；

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

四、政治黑闇百姓愁苦。

原因，梁啓超說是

除却第二點稍帶點那時代色采外，其餘三種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通有的現象。

因爲他根本把握不着時代，把握不着思潮，當然不能拿出一定的觀點，以致所說所求，皆係

錯誤。這求因的方法應該指正的三。

「評判」，胡適似乎很自覺；所以他說：

但是我說的評判，並不是把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種主觀的評判，沒有大用處，如今所說，乃是客觀的評判。

怎樣叫着客觀的呢？他接着說：

這種評判法，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這些效果的價值，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這些效果，大概可分爲三種：

（甲）、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的思想和後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

（乙）、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

（丙）、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麼樣人格來。

當然，胡適是實驗主義者，這處正是他對於中國哲學運用實驗方法的露骨表示。不過實驗主義的方法，究竟是方法，拿實驗主義的方法，去治中國哲學史，不是拿這種方法，就代表中國哲學的意義。中國哲學，如照胡適所說效果的三種看，簡直可稱爲中國實驗主義史，這不

是主觀的評判嗎？這不是把「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嗎？

退一步說：一種學說，發生效果與否，是不是可以看出價值？老子的學說，一變而為莊子齊物論，一生死；再變而為西漢之黃老學，三變而為三國之黃巾道，四變而為……這種結果，這種影響，我們斷言是什麼價值？那種價值？墨子的三表法，胡適說過：

往往有許多學的用處，或在幾百年後始可看出；或者雖用在現在，牠的真用處，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裏。

在骨子裏的用處，在骨子裏的效果，却被他看出，但若看不出，怎辦？這是評判的方法，應該指正的四。

總之：胡適中國哲學史所運用的方法，不僅不能「希疑」「用這些方法」的，「做」不「出」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他自己的方法，由上面看來，自己也「站不住」，又斷言什麼呢？

（乙）史料問題

中國哲學史「史料，胡適把它分作

兩種，「原料即是各哲學的著述」，這不消說得。副料，據說

（一）原料

（二）副料

凡古人所作關於哲學家的傳記。軼事。評論學。案。書目，都是哲學史的副料。我不懂，胡適兩隻眼睛，為什麼只是會死釘在書本上，書本以外實物，如殷契周金，都是很足參證古代哲學的東西，他竟把它棄之不顧，說他不懂得嗎？那末，在書本中也該範圍擴大些了，前八世紀到七世紀中國的哲學，是「除了一部詩經別無可考」嗎？「其餘一切」，都是「無徵則不信的材料」嗎？書經洪範，易經中許多部分均應有參證之為要」這是一。

除了關於哲學家的傳記。軼事。評論。學案。書目以外，他家的學說反證和參稽；那時書籍映襯和互徵，……是不是都可不顧？這是二。

管子列子晏子春秋等，雖屬偽書，然可斷定為兩漢以前產物，在這些偽書之中，是不是一點尋出有哲學上的價值和意義？這是三。

半眞半偽的書籍如莊子韓非子等，其偽的部分，是不是全無關係，而可盡行廢棄？這是

四，一種眞的材料，未將其全部整理分析以前，是不是割裂一部分——如詩經老子，卽可代表他的學說？這是五。

古代哲學，不僅在哲學本身學說上應該着力，其他如人類學，人種學，經濟學，文學，和神話等，不能明瞭，能夠做出「完備」「精確」的古代哲學史嗎？這是六。

以上六點，看胡適所說，只處處表現他的淺陋，他的狹隘。再看他認爲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的「審定史料之法」怎樣？他說：

凡審定史料的眞僞，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

（一）史事

（二）文字

（三）文體

（四）思想

（五）旁證

我們祇要看了前面幾段胡適對于哲學的史料認識僅僅如此，那末他所審定的眼睛，也不會放開看到書本以外，而他所說的旁證，亦不過「如清代惠棟閻若璩諸人，考證梅氏古文尚書之僞，所用方法」全在故紙堆中，鑽來鑽去，似書本以外，皆不足被他一顧，這是何等粗率！

（丙）思想問題

中國哲學史，究竟是中國的哲學史罷？一切敘述，當然應以哲學爲中心，名學不過是一部分，以名學代表中國哲學史，那末胡適在美國應博士論文的先秦名學史，爲什麼不叫中國哲學史？對外國人方法不管好醜，小心翼翼爲他宣傳，對于中國人名學和哲學應可這樣抹殺一切嗎？欺騙掩飾嗎？然而梁啓超老早認定「不如叫中國名學史爲適當，」然而胡適却可不管，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一。

中國哲學史，究竟是中國哲學史能？胡適是痛詆過附會的，但是老子的「天道」，一定要說他「是西洋哲學的自然法」如「期賓塞的政治學說」；「少正卯鄧析，檢直同希臘古代的哲人」，「孔子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之流，莊子符于海智爾似乎欲將中國哲人，都變成外國的哲人這種附會，還要怎樣附會？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二」。

一種哲學，當以哲學的分類——如認識論，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而分類，老子的論天道，論無，名與無名，無爲，這是什麼一種分法？孔子篇內的易經，墨子和別墨當中，夾着一篇楊朱，這是什麼類法？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三。

一家哲學思想，應以全部思想分析爲依據，各家的學說，都只抄其一部分，甚至一二句，即以爲某人思想，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四。

所謂法家一章，法家之名，古代有沒有，且不管他；管子申子商君書眞假，不必問他。古代的法理哲學，在詩經尙書左傳中也可以看到一部分，爲什麼認定它是假書，不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部分，而被他隨便蒙混過去？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五。

很簡略的說來，思想已是錯誤如此，中國哲學史與要「變色」了！

（丁）編製問題

（甲）敍述

中國哲學史大綱由老子而孔子，由孔子而孔門弟子，而墨子，而楊朱，而別墨，而莊子，而荀子以前儒家，那荀子，歷史的次序，很是分明，但一部哲學史，是不是僅以年代發生

先後，排列像陳列館一樣，而不必理出學派系統來呢？

一家的哲學敍述，如老子是：

（一）老子列傳

（二）老子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四）老子論天道

（五）論無

（六）名與無名

（七）無爲

（八）人生哲學

如楊朱是：

（一）楊朱篇

（二）楊朱

（三）無名主義

（四）爲我

（五）悲觀

（六）養生

如孟子是：

（一）孟子考

（二）論性

（三）個人位置

（四）教育哲學

（五）政治哲學

是不是可以任意顛倒前後，而不必以一定基點敘述呢？

哲學的發生，在一部哲學史，尤其古代學史，當然該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罷！中國哲學史大綱，所述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僅僅兩章：

第一章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

第二那時代的思潮。

十頁又三行，叫引詩經已佔去五十八行，列古代社會的階級五等，（一王、二諸侯、三大夫、四士、五庶人、）佔五行；前三世紀（前八世紀、前七世紀、前六世紀、）佔三行……「結胎」始終未見怎樣「結」法，那時代的思潮，又幾全被詩經所謂名派的引證，幾乎佔滿，這種「心靈手敏」（引蔡孑民先生序語）也太「靈」太「敏」了罷？

（乙）分類

中國哲學史大綱分類的錯誤，說出來要氣得發暈！有時候「篇」不能包括了「章」，有時候「章」又逸出「篇」之範圍以外，甚至「篇」「章」混亂，毫無條理。就大目來說：

一、第二篇「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分爲「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和「那時代的思潮」我初看起來，以爲是第一章和另又一節，然而它是那樣的並列，並包括在第二篇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他眞會「生」？可惜未「發」！

二、硬將易經拉在孔子底下，孔子的哲學僅僅是正名主義和一以貫之，總覺有點不好意

思想。

三、墨子有略傳，有哲學方法，有三表法，有墨子的宗教，墨子的哲學呢？墨子的宗教，即墨子哲學嗎？這只有胡適可以說得出。

四、以孔子墨子例，既然分出各章，第一章均為各人列傳，而莊子為什麼不另列而附于第一章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內。

五、第十一篇荀子，第一章亦以荀子標出，以孔子墨子例之，固不合，以本篇概本章，而又另出他章，實為不通。

六、孔門弟子，可另立一篇，楊朱可另立一篇，孟子僅屬于第十篇之一章，輕重失措。

七、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各篇，均以各哲學家為單位，第十篇以荀子以前的儒家作題，雖亦可用，但內括兩章，第二章為孟子，第一章大學中庸，則係書名，書不能代表作家。

八、易經既可拉入孔子篇內，孔門弟子且另立一篇，大學與中庸不管其何人何手所作，儘可歸入恁何一篇，不應附于荀子以前儒家內。

至各篇細目體例，尤爲紊亂：

一、老子哲學，由老子列傳而老子考，而革命家的老子，而……一「傳」其姓名年代，一「考」其書，而後再述哲學，此尚可通，荀子篇內，又另立荀子一章，包括荀子略傳，與荀子兩節。

二、由老子公孫龍子荀子例，一人略傳，與一人的著作，是分開敍述，而孔子列傳內，孔子著作均附其中，墨子莊子同；而孟子又名爲孟子考，包括姓名年代著作。

三、各家均先姓名年代而後著作，楊朱則先著作，而後姓名年代。

四、孔門弟子篇，以孝，禮分類，易經既屬孔子，以易、象、辭分說，這些我們處處看到胡適的不學和淺薄，要詳細的指責，逐處皆是。

(三)中國哲學的起源與古代哲學的中絕

(甲)哲學的產生

在今日殷墟發掘的書契中，所指示于我們的，紀元前一千四百年間我們已有那樣進步的

文化，那末哲學的產生，當然不能在哲學成熟的前兩三百年，方才說起，這是顯明的事實罷？胡適把

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當作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

這個「胎」是怎樣的「懷」法呢？他沒說，他只說那時代的時勢，是：

第一連年戰禍百姓痛苦；

第二社會階級漸漸消滅；

第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

第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

是說：

參考詩經國語左傳幾部書，仔細研究起來

的。他說「那時代的思潮」——詩人時代，將「這時代」思想，分爲若派：

第一憂時派；

第二厭世派；

第三樂天安命派；

第四縱慾自然派；

第五憤世派。（激烈派）

只是在一部詩經中尋找出來的。

那時代的時勢，是不是產生那樣哲學的原因呢？在胡適當然要說是的。他說：

時代和思潮，很難分別，因爲這兩事，又是互相爲因果的。有時先有那時勢，才生出那思潮來，有了那種思潮，時勢受了那種思潮的影響，一定有大變動，所以時勢生思潮，思潮又生時勢，時勢又生思潮。

但據梁啓超說：

除却第二種稍帶點那時代的色采外，其餘三種，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通有的現象。

這裏面是有兩層含義：

（一）別的時代，是一樣的時勢，爲什麼沒有產生那樣哲學？

（二）拿老聃孔丘二三百年前的時代，來作其後四五百年所生的哲學的背景，是等于拿明末清初的社會，來做現在的哲學背景？

那末這個「胎是結錯了」。時勢生思潮，思潮又生時勢，中國哲學，既是尋不出「胎」來，難到如某先生所以的雞生蛋蛋生雞一樣嗎？那末所謂三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必定是在地下滾來滾去（互相因果）滾出來的了。

那時代的思潮，是不是照胡適所分的那幾派呢？一部詩經是不是可以代表呢？然而如果眞以時經代表來分，我們還可以多分些出來，因爲只要舉出幾首詩出來，就可以任意附會。他還說：

> 這幾派大約可以代表前七八世紀的思潮了。請看這些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到了伐檀和碩鼠的詩人，已漸漸的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的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詩人，對于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熱駡？又看碩鼠的詩人，氣憤極了，把國也不要了，去尋他自己的樂土樂國。到了這時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種子了，這些革命種

子，發生出來，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時代。

這裏可以分出幾點來說：

第一、爲什麼「這幾派」「代表前七八世紀的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

第二、伐檀碩鼠所種下的革命種子，怎麼便成爲老子孔子時代？

第三、伐檀碩鼠的革命的種子，是怎樣下的？

第四、那幾派既都是消極，爲什麼這伐檀碩鼠便會有了「一點勃勃獨立的精神」？

第五、伐檀的詩人冷嘲熱駡，碩鼠的詩人氣憤，何以不同？

第六、這些除了幾首詩以外，還能尋出其他的證據，找出一定是這樣，一定是與哲學有必要的關連嗎？

（乙）古代哲學的中絕

在過去一般對古代的中絕原因，大多以爲是歸罪于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事，胡適對于這層，却有些見解。他說：

秦始皇燒書政策，雖不無小小的影響，其實是一場大失敗，所以我說「燒書」一件

事，不是哲學中絕的一個眞原因。

他抽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段，以爲

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這種方士，多坑殺了幾百個，於當時的哲學，只該有益處，不該有害處，故我說「坑儒」一件事，不是哲學中絕的眞原因。

這兩層見解，與謝無量那樣人云亦云，自是高明得多。我小時，曾亦讀過一篇文章，（題目作者均忘却）與胡適的見解。可算不謀而合，且不說它。胡適既認「焚書」「坑儒」，不是哲學中絕的原因，他所說中絕原因，是什麼呢？他說，有四種眞原因：

（一）是懷疑主義的名學；

（二）是狹義的功用主義；

（三）是專制的一尊主義；

（四）是方士派的迷信。

第一、懷疑主義的名學，就懷疑主義本身上說，它是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就莊子懷疑主

義說，更沒有這原因：

(一)莊子齊物篇論在那時能夠發生多少影響，是一大問題，漢書藝文志有老子鄰氏經傳氏經，而沒有莊子經，漢初有黃老學，而沒老莊學。

(二)別墨的「論」「辯」，是否因莊子反動，懷疑是非，懷疑知識，而「便可把那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一齊都打消了」，胡適在哲學史第八篇說「墨學滅亡的三個原因」——由於儒家的反對，由於墨家學說之遭政客猜忌，由於墨家的後進詭辯太微妙，，莊子並沒有一點嫌疑，此處何以竟直指爲正犯。

(三)和莊子同時的慎到田駢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學說，「容易養成一種對於知識學問的消極態度」，墨學就這樣容易的因之「中絕」嗎？

這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眞原因」是不一貫的。

第二，狹義的功用主義雖是引出荀子韓非來，而所謂這種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與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的阻力，却未說出「爲什麼」來？而

秦始皇說吾并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

以為

便是這種狹義的功用主義的自然結果。

秦始皇「焚書」，既無關於哲學的中絕，此處却又提起他來，認為是「最大的阻力」。這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二個眞原因，也不「眞」了。

第三，專制的一尊主義，據說只有荀子「一句」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這九個字，便是古學滅亡的死刑宣言書。

這「一句」的力量，如此其大，古學的滅亡也太容易了！其實照這九個字上下文，把它連串讀去，也不過如其他的學總「以聖王為師」，以「聖王之制為法」，說它是「專制一尊主義」，別家也不能逃脫，說它是「封閉政策，自殺政策」，何獨偏責於荀子？這是古代哲學中絕的眞原因，第三不「眞」。

第四，方士迷信的盛行。據說古來通行的迷信宗教，約有幾個要點：

（一）是一個有意志知覺，能賞善罰惡的天帝；
（二）是崇拜自然界種種勢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類；
（三）是鬼神的迷信，以爲人死有知，能作禍福，故必須祭祀，供養他們；

後來又發生幾種原因，頗爲宗教迷信，增添一些勢燄：

（一）是墨家明鬼尊天主義；
（二）是儒家的喪禮祭禮；
（三）是戰國時代發生的仙人的迷信；
（四）是戰國時代發生的陰陽五行之說；
（五）是戰國時代的鍊仙藥求長生之說。

這些我們，都應該全部承認是確有的。但是尋不出它們怎樣使古代哲學中絕的必然的關係？胡適是主張「拿證據來」的人，可「拿出」什麼「證據來」呢？「方士的宗教」的「小史」，是說了不少，但却未說出它一定使哲學滅亡的關連來！如果認爲

老子到韓非三百年哲學科學的中國，一變竟成一個方士的中國，

是由於齊威王宣王昭王秦始皇那班人「熱鬧」起來，而積極方面，又受了這十幾年最時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學從此遂真死了。這「一變」，是怎樣的「變」出來的？「同化」怎樣的「同化」的？「同化」了怎樣就使古代哲學「真死」？這些，胡適未具體答覆我們，我們當然對於這裏所謂哲學滅亡的第四個真因，也不能認為是「真」。

總之：古代哲學中絕，自有其真原因在。秦漢社會，制度，經濟，政治之不同於周秦，自不容有相同之哲學，尋序進展，胡適既把握不着哲學的起沉，更不明古代哲學之所以中絕，這也「是很自然的」。

(四)先秦諸子哲學

(甲)老子

第三篇老子部分，胡適是把他這樣的分法。

一、老子略傳；

二、老子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四、老子論天道；

五、論無；

六、名與無名；

七、無為；

八、人生哲學。

你要是稍為懂得一點哲學知識的人，你可看出這是什麼一種哲學的體系？你要是不知道老子哲學的人，你可看出什麼是老子哲學來？且看內容：

在今日古代實物逐漸發掘，繼續供我們研究的時候，我們對於古代史實上有不能了解的，我們頂好等它百年千年，等到實物出土可以證明某種史實了，那末你所懷疑的問題，自然而然的有準確的答覆給你。不然的話，你在故紙堆中，尋出一點證據是這樣說，他在故紙堆中又尋出些證據，是那樣說，好像故事中瞎子摸象一樣，都有所是，都有所偏，如果你要走

怕陽壽短促，不能等待的話，那末你對於人家的學說，你想推翻它，推翻了而建立自己主張，一般對於這主張，確認而無疑義時，那末我們也不妨盼望學者先生和大學博士，抽些工夫，多多的考證些出來。

老子的年代，經過清朝崔述汪中以及梁啓超一班討論之後，在我的意思，目前未拿到實物證實以前，儘可去考證比這些所急要的整理一下，（天意：目前中國舊學，不在專門考察某種零星問題，是需要對於某一學說，大大搜理，材料足，而後真理出，真理出，而古人面目復見，後人卻省一番多從於此故紙堆中討生活，而見奇也。）如認爲必得考出，那末要請你切實研究一下，梁啓超對於老子所提出六個理由，認爲戰國以後人物，雖不必說是對，然他總經一番思索，才能有那樣有條理的見解。胡適的老子略傳，既據閻若璩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當孔子三十四歲，認爲還有可疑之處：

（一）則曾子問是否可信；

（二）則南宮散敬死了父親，不到三個月，是否可同孔子適周；

（三）則曾子問所說日食，即係可信，雖係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

既未另舉他證，又無理由可述，竟以

無論如何

四字，硬轉過來，就說是

孔子適周，總在他三十四歲以後，當西歷紀元前五一八年以後。

「後」多少呢？又以「大概」二字來一下，

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與四十一歲之間，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於周靈王初年，當西歷前五七〇年左右。

啊呀！「大概」「不過」「左右」，我不知他在「傳」的什麼—恐怕是在轉（妄聲）呢？一部哲學史，對于一個哲學家，是否有必要遞傳，我不曉得如果是需要，「傳」出這些莫明其妙的來，司馬遷已經所給於我們的「恍恍惚惚」很夠了，何煩胡適再來？

我記得梁啓超發表對於老子雖度後，有位張煦先生開玩笑，完全拿法律上不服判決的口

吻，（題目已記不清楚）逐條辯難，雖是游戲文章，倘旁徵博引，反復究詰，認爲「中國第一偉大幸事」的中國哲學史僅能引出閻若璩的「可疑」之「斷定」，崔述（洙泗考信錄）汪中（述學）畢沅（道德經考異序）等，都不值得胡大博士一顧，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以「開山」哲學史的「胡適」，對着「開山」的哲學家的老子「開山」見「開山」，應該「開門見山」，說個爽快，那曉得被胡適一「左右」，這位開山哲學家，只是「大概」「不過」而已，內容是更可想見了。

一個人的反動或革命，是可在思想中尋出，但也該看其全部行爲。老子我並不認爲他是一般所謂消極派，但照胡適所註，什麼「革命家」的尊號，可是他也承受不起。我們不要一句二句話來引證，我們看老子全部思想行爲，他對於當時經濟政治社會，雖很多過激言論，但充其極，實現他的理想政治「小國寡民」，這種

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守衛的甲兵代人工的機械，行遠傳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毀除，要使人類回到那無知無欲，老死不相往來的烏托邦，

在人類進化過程上說，是不是「革命」。況且他明明說「無爲」，卽便認爲他「無爲」中「有爲」，亦不過如此，正如甘地之抵抗英國，完全以消極之意志出之，而不合作，能耐苦，倘不如甘地之積極也。

第四節老子論天道。胡適將「天地不仁」的「仁」字解作：

「仁」卽「人」的意思，中庸說「仁者，人也」，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劉熙釋名說「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說不是人，不和人同類。

這太煩心了！查了一刻辭典，還引來「天人同類」說，以相印證，在胡適總算是拿着證據出來，千眞萬確，其實這種證據，是錯誤的，是附會的，「天地不仁」的「仁」字，把它當「人」字解，下句「聖人不仁」，固然發生矛盾現象，而只引「天地不仁」兩句就以爲

老子這一個觀念，打破古代天人同類的謬說，

這是多麼武斷。其實要解釋老子，要找證據，老子本書是顯然有的，固不必去兜圈子，講使他人。卽老子本書沒有，所有引證，皆要請先「實驗」一下，在全部思想中，有無不合現象。老子「仁」字的解釋，很清楚明白在書中表示過，所謂

大道廢有仁義，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失道而後仁，

對於「仁」字觀念，並沒有像胡適所說「含有慈愛的意思」，更並不將「仁」作「人」，他認「仁」是「道」廢後生出來的東西，有了「仁」，就反生出來不「孝慈」的名詞，「天地」是「道」，「聖人」亦是「道」，「道」高出於「仁」之上，自然不「仁」。舍本書中很明白的解釋不說，而要去牽強附會，我恐怕大博士是太忙的關係，不能去全部研究此書，見着一點，卽寫一點，由他分類上看來，混亂滑稽，是很可證實的。

（乙）孔子

孔子一篇裏，最大的錯誤，是把易經附入於孔子，而述易經以易，象，辭為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易，象，辭，照胡適所說：

第一，萬物的變動不窮，都是由簡易變作繁賾的。

第二，人類社會的種種器物制度禮俗，都有一個極單的原起，這個原起，便是象。

人類的文明史，只這些法象實現，爲制度文物的歷史。

第三，這種種意象變動作用時，有種種吉凶悔吝的趨向。都可用「辭」表示出來，

使人動作，都有儀法標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爲非。

據我看，這頂多是述敍易經的內容，何嘗表現出孔子的哲學一點？講易經固然不能如前人拿河圖，洛書，纖緯，術數，先天太極，……去說，但也不能不說一定「掃除乾淨」，易經的本身，亦不是以易，象，辭三個觀念可概括儘盡的。

孔子的時代，胡適拿孟子的話

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作爲孔子時代的背景，「暴行」或如所說：

就是孟子所說的「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了。

「邪說」，胡適舉出三人：

（一）老子

（二）少正卯

老子如果說他

（三）鄧析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聖人不仁，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去知，民利百倍。

是邪說，那末上面所說「革命家」何來？「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正是昔時名言讜論，孔子說的「子為政焉用殺，」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意思，不是相同嗎？何以出諸老子，就為「邪說」呢？

「聖人不仁」正是捧聖人往「道」的椅子上去坐，胡適以為「不仁」是侮辱聖人嗎？「絕仁棄義」自是看穿那時假仁假義的行為，而有那種奮激之言，與「天下不歸楊則歸墨」那種影響比較一下值得什麼？

少正卯的故事，是出乎王肅假造的孔子家語，鄧析的學說，拿呂氏春秋來說恐怕有點不

好意思罷！

所謂「正名主義」是：

(一)正名字，

(二)定名分；

(三)寓褒貶。

以一部春秋做基本，以公羊穀梁兩傳做證據，我只覺得是淺薄不堪，我更想出來，拿什麼話來批評他，恐人家要說我一樣的淺薄。

「一以貫之」，以孔子方法論作爲孔子哲學的分類，可謂奇之又奇奇到無可說的境界。

最怪誕的，是說孔子的學：

他把「學」字當作讀書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說的影響，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這便是他的流弊。

這眞是寃枉！孔子的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胡適可曾讀過？

有教無類，

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其最闡明的設立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胡適可曾知道？胡適以前所認孔子為「氣象闊大的人物」，現在又變成讀死書的老學究，而且「幾千年的書生廢物，都是他的流弊」，這真從何說起？

諸子哲學中，以孔子部分所說的為最多，亦以孔子部分所說最無條理。我們看章目固然看不出孔子的哲學，是可以拿「正名主義」，或「一以貫之」去代表，看了「正名主義」和「一以貫之」，也使你尋不出孔子哲學的頭緒，除非你是附和胡適所說的那樣說法。

（丙）墨學

墨子和別墨兩篇，大家都以為胡適是有很精確的見解，我看了也覺不錯。不過，我有不同意的幾點，是：

第一、認墨子是宗教家，將墨子哲學天志，兼愛，非攻、明鬼，非命，節葬，短喪，非樂，尚賢，尚同，就統統認為「墨教」的「教條」，我的不同意，正如趙蘭坪蔣維喬把墨翟與

耶穌比較，某人說墨子爲回教徒，一樣。

第二、將名家屬於別墨，我是要做一次媚外行爲，贊成日人渡邊秀方所說：

（一）、墨辯六經，是墨子所放下基礎的學理，這些學理，乃古代上自天文，下至戰爭築城及日常瑣事之知識之總合。不過，墨辯收集之，由別墨之手增補，別墨之徒，受名家之影響，集古今辯說而研究之。

（二）、莊子天下篇「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可見惠施爲當時詭辯大師，其徒之系統，決不一致。而惠施的思想，不和儒墨同系統，而和莊列同系的。（參看莊子天子篇）

（三）、莊子天下篇，將惠施與別墨別論，以辯者汎稱當時之辯論家，而墨辯不過其中之一羣而已。

（四）荀子非十二子篇，以惠施與鄧析並論，可見惠施之淵源甚遠。

惠施公孫龍是大演說家，是大政客，他們學說，是有獨立存在的意義。胡適只見到惠施公孫龍時代，爭辯最烈的問題，莊子天下篇所舉諸人議論，無不在墨辯六篇中

，討論過的。

加果這種論據是眞實，在其他如孔孟學說中，有相符合的，如仁義知材等議論，也能說他是別墨嗎？

第三、墨學的發生，自有其發生的原因：胡適說它是：

儒家自孔子死後，那一班孔門弟子，不能傳孔子學說的，大端都去講究那喪葬小節，請看禮記檀弓篇，所記孔門弟子子游曾子種種故事，那一椿不是爭一個極小瑣碎的禮節？……再看一部儀禮，那種繁瑣的禮儀，眞可駭怪！墨子生在魯國，眼見這種怪現狀，怪不得他要反對儒家，自創一種新學派。

這「眞可駭怪」！一種哲學的發生，是從另一學說反響而來的，那末一部哲學史，必將成爲瑣運的哲學。墨學不錯是反對儒家，反對儒家已是建立了一種哲學的基礎，何能說是從之發生呢？

（丁）莊子

在莊子一篇，我們所最不能承認的：以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說它

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並引至樂篇

種有幾……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說什麼

幾字從𢆶，𢆶字從幺，本象生物胞胎之形……此處的幾字，是指物種最初時代的種子，也可以叫作元子。

說什麼

這些種子，得着水便成了一種微生物，細如斷絲，故名爲㡭。到了水土交界之際，便又成了一種下等生物，叫做鼃蠙之衣。到了陸地上，便變成了一種陸生的生物，叫做陵舄，自此以後，一層一層的進化，一直進到最高等的人類……是顯而易見，毫無可疑的。

說什麽

末三句，所用三個機字，皆當作幾，即是上文種有幾的幾字。……從這個極微細的幾，一步一步的「以不同形相禪」直到人類；人死了還腐化成微細的幾：所以說，萬物出於幾，皆入於幾。

了不起！

自古至今，無人能解」

的「這段文字」，胡適覺不

輕易放過

它，而有這種妙解，解得達爾文要五肢投地，莊漆園要死（非喜也，因已死去）笑顏開！可是進化！進化：逍遙游和齊物論太不爭氣了，什麽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哪？什麽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哪？可是鵬鷃斥鷃，朝菌大椿，天弟稊米，毫末丘山，一視同仁，弄得不進不退，亦進亦退，「大缺點」來，胡適就「放」不「過」去了！

其次胡適以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極爲重要」，認爲

名學的精義，全在於此。

於是引秋水篇引齊物論。再引秋水篇伸述

這個變化進化的道德觀念和是非觀念。

覺以爲

有些和德國的海智爾相似。

說是

海智爾說人世的眞僞是非，有一種一定的進化次序，先有人說這是甲，後有人說這是非甲，兩人於是爭論起來了，到了後來有人說這個，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這個是乙，這乙便是甲與非甲的精華，便是積甲與非甲之大成。過了一個時代，又有人出來說這是非乙，於是乙與非乙，又爭起來了，後來又有人採集乙與非乙的精華，說這是丙。海智爾以爲思想的進化，都是如此。

但我們從莊子一篇齊物論看，他既主張齊物齊論，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只是對待，並非變化或進化，胡適以爲是

指點出莊子名學的一段眞理，

這個「理」，恐怕是要變做「假」的了。

（戊）孟子

康有爲的大同書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於是梁啓超使它

民治主義存焉；（天下……與能）

國際聯合主義存焉；（講信修睦）

兒童公育主義存焉（故人不……其子）

老病保險主義存焉；（使老者……有所養）

共產主義存焉；（貨惡……藏諸己）

勞作神聖主義存焉。（力惡……爲己）

胡適自然可說孟子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君之視民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是

很帶有民權主義意味。

但孟子是有

得乎丘民而爲天子

之說，而顯「得天下」以「得其民」，則所謂「民權意味」的，不免根本上有些動搖。附和曲從，終避不了一種學說本身上，有力的反證。

孟子政治哲學，據說：

孟子生在孔子之後一百年，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故不但尊重個人，尊重百姓過於君主，還要使百姓享受樂利。

楊墨是因：

孔門有一派把一個孝字看得太重了，後來結果便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這種家庭倫理的結果，……自然生出兩種反動。一種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如楊朱爲我主義；……一種是極端的爲人主義，如墨家的兼愛主義。

照他所下的注解：

凡攻擊某派最力的人，便是受那派影響最大的人，孟子攻楊墨最有力，其實他受楊墨的影響最大；荀子攻擊辯者，其實得他辯者的影響很大；宋儒攻擊佛家，其實若沒有佛家，那有宋學？

那末由他的例，反證說：

凡不攻擊某派的，便是沒有受那派影響，

你相信嗎？再推一例：

孟子攻擊楊墨，其實沒有楊墨，那有孟子。

你假是頭上不在發熱的話，對於這大博士的高論，除了唯唯否否外，你有多少閑工夫去算這種窮賬呢？

（己荀子）

本來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先秦名學史脫胎而來，如果還是說叫名學史的話，那末荀子這一篇，我們還有相當的滿意。可是既名哲學史而「名學」佔據全部三分之一以上，總覺有些不大像樣。

就以名學說罷！他將墨家論的名，與儒家的名，比較一下，說：

墨家論「名」，只有別同異一種用處，儒家却於別同異之外，添出明貴賤一種用處。明貴賤卽是寓褒貶，別善惡之意，荀子受了當時科學家的影響，不能不說名有別同異之用。但他依然明貴賤，看得比把異同別更爲重要。

這裏，我們有三點要問胡博士：

(一)明貴賤怎樣，就是寓褒貶別善惡的？

(二)用荀子受了當時科學家的影響，怎麼就不能不說名有別異同之用？

(三)荀子爲什麼把明貴賤看得比同異更爲重要？

這些，胡適能夠解答我們嗎？

再孟子和荀子論性的不同，胡適是把他們比較了，他們的不同，究竟在什麼地方？爲着什麼原故？胡適亦曾想到沒有？

(五)結論

以上所述，均係指其大者而言，如欲逐篇逐章，詳細指正，那末這種字數的容量，差不多可以不弱於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本書，在意義上無此必要，在時間上亦不值得，因有那些閒工夫，把他去逐細指正，我們任可寫些有意義的東西，比較還有意味。這裏只簡略的這樣把他分出，那末他的價值，也可想而知了。

三　活文學與死文學

——白話文學史——

見面禮

與其說胡適白話文學史有批評的價值，無甯說張競生性史應該入國史館，因爲性史尙未失却人性本能，而白話文學史是僵死的尸身，復活起來，無論他怎樣在人羣中跳躍，這種不死不活的形態，令人見了，總有些難受。

然而這是胡適「辛苦得來」的，還有「七十萬字至一百萬字」的希望——只是希望，這有已成「二十一萬字」「佔了近五百頁」的紙張，中國哲學史要使「中國哲學史變色」，這白話文學史簡直又是要叫中國文學史變形，我們似乎又不能不說，只好閉着眼睛，捏着鼻子，同這不死不活的僵尸，握一下手。

本來我的意中，是想做一部反白話文學史的，但現在的時間，還沒有充分的允許，逐篇逐章，駁下去，在這裏是做不到的事，所以只好在大體上，去同它略略開個談判。

我這裏所要申明的，我不是古文的，「肖子肖孫」，根本我全不想做任何，「肖子肖孫」，——但也不全做「逆子」，更起不是舍棄自家嫡傳的父祖不肖，而去肖野種乾爺。我只是想着我既得的理智，在主觀中尋出一點客觀。——我不敢說，完全客觀，這句話，因爲批判人家東西，沒有主觀，不配拿筆，不過在主觀中，是具有客觀罷了。

梁啓超贊嘆中國哲學史是「空前創作」，這部白話文學史我要來「斷定」一下，不僅一空前」，一定還要「絕後」。

「學問成家數」的梁啓超，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學問成家數」的胡適，可以引爲「光榮」「學問不成家數」的我，看到正道地「成家數」的白話文學史必恭必敬的，請他出來，而又鞭尸三百，胡適要說是恥辱，我也覺得更慚愧。

胡適學問既已「成家數」，我們這一般沒有「學問」的，或有「學問」而未「成家數」的我們，也應該倣照周秦諸子孔學老學墨學的例，稱爲胡學；但胡適是反對死文字的古文，現在還照他的意義，「學」字白話可譯作「說」，就這樣的稱他是「胡說」罷。

其實一部白話文學史道地的一部胡說史。不信嗎？這章分給你看：

胡說章第一　語文的分合

文學是文字組合成功的，文字是代表說話的，所以胡說博士看他是三位一體，因爲他所提倡的白話文，是，

一、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

二、淸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

三、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易的話。

他所做的白話文學史，是：

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的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淸楚近於說話的作品。

換句話說：

說漂亮話，寫成文字，便是文學。

在文字發現的最初期，所謂「語文一致」，是無疑義的。文語分家，是在什麼時候呢？胡適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了。

怎樣見得？

戰國時，各地方言很不統一，孟軻說：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諸。曰，使齊人傅諸。曰，一齊人傅諸，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達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書中，又提及「南蠻鴃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韓非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可見當時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當時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見文字與語言，已不能不分開了。

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有「同文書」的必要，史記記始皇事，屢提及「同書文字」（瑯琊刻石）「同文書」（李斯傳）「車同軌書同文字」（始皇本紀）後人往往以為秦「同文書」，不過是字體上的改變，但我們看當時的時勢，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當日的「書同文」，必不止於字體上的改變，必是想用一種文字作為統一的文字；因為要做到這一步，故字體的變遷，也是必要。

到了

「古文在漢武帝時已死了，」「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種政策，」所謂「文學掌故」「博士弟子」逐漸加多，

後來時時加上修改，總名叫做科舉——眞是保存古文的絕妙的方法。……由漢武帝到現在，足足的二千年，古文體的勢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

然而

元朝把科舉停了近八十年，白話的文學就蓬蓬勃勃的興起來了，科舉回來了；古文的勢力也回來了。直到現在科舉廢了十幾年了，國語文學的運動，方才起來。

這位白話小姐，也太奇了，怎麼見了科舉先生，他就躲避，科舉不在，她又出來；他們有什麼必然的相冲相尅麼？然而白話文學中所請來的摩登女郎，卻又都是科舉先生的姨太太呢？

胡說章第二　文學的來源

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

小兒女

村夫農婦

痴男怨女

歌童舞妓

彈唱的

說書的

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與新格的創造者。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條。

證明來看：

國風來自民間，楚辭裏的九歌，來自民間，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辭，也來自民間。以後的詞，是起於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於歌妓舞女的，彈詞起於街上的唱鼓詞的，小說起於街上說書講史的。——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上，那一樣不是從民間來的。

貴族不能創造文體麼？歌妓舞女是民間的麼？專為一般豪富吏民和花花大少公子哥兒玩的樂府：（胡說樂府即是唐以後的教坊）能代表民間，一般意識麼？然而曹子建七步成功的「煑豆燃豆萁」的詩不是白話麼？李延年的「一顧傾人城」的詞是民衆所想到的麼？

胡說章第三　國語進化古文退化

白話文學史引子裏說：

我們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一千幾百年歷史進化的產兒。……國語文學，若不是歷史進化的結果，這幾年來的運動，決不會有那樣的容易。

但

這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史，只有自然的演進，沒有有意的革命，

所以

元曲出來了，又漸漸的退回去，變成貴族的崑曲；水滸傳與西遊記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甚至于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出來了，人們還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

因此，他們

在那緩步徐行的文學演進的歷程上，猛力加上一鞭，這一鞭就把人們的眼珠子打出火來了。

可「不得了」！怎樣？

因爲那一千多年的啞子，從此以後便都大吹大擂的做有意的鼓吹了。

要不是

假使十年前他（我）們不加上這一鞭……也許十年之後，也許五十年之後，這個革命總免不掉的，

那末

這十年或五十年的寶貴光陰，豈不要白白的糟塌了嗎？

多謝他們！更多謝胡說博士！因爲他們「大吹大擂」，只是「加上一鞭」，兩隻眼睛只曉得向前看的，胡說博士一方面「加上一鞭」向前進，一方面回過頭來，拉出列祖列宗所謂進化的結果，歷史成績來，擺在後面做保障。防備「一鞭加上」太猛烈的時候，恐怕折了腰，將這所胚的胎兒壓下，到也是一番苦心：

不過照胡說博士新訂的綱目：

一、引論

1.宋初的文學略論
2.北宋詩
3.南宋的白話詩
4.北宋的白話詞
5.南宋的白話詞
6.白話語錄
7.白話小說

七、金元的白話文學

1.總論
2.曲一 小令
3.曲二 絃索套數
4.曲三 戲劇
5.小說

八、明代的白話文學

1.文學的復古

2.白話小說成人的時期

九、清代的白話文學

1.古文學的末路

2.小說上　清室盛時

2.小說下　清室末年

十、國語文學的運動

看，也不過如王靜广先生的宋元戲曲史序所說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楚之騷；

漢之賦；

六代之駢語；

唐之詩；
宋之詞；
元之曲。

奇怪，國語進化會同文學「進」到一條路上來了。國語算是這樣的進化罷，古文怎樣呢？說是「肖子肖孫」，「模倣」前代「一蟹不如蟹」麼？那末古文是退化了！

胡說章第四　白話中心古文傳統

「白話文學史」，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一個什麼地位」，聽他「老實」向我們「說罷」：

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古文傳統史」罷了。

古文怎樣「傳統」？自然是那般「肖子肖孫」

做文的只會模倣韓，柳，歐，蘇，做詩的只會模倣李，杜，蘇，黃，一代模倣一代。

「模倣」下的。白話怎樣中心？因為他是「不肖子」

因爲不背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

還「背」「不背」，在形式方面說？還是在意義方面說？要在形式方面說，同是詩，而有初唐盛唐晚唐的分別，同是詞，而有南宋北宋的不同，這無關「背」「不背」了！要說意義，那一時代應該那一種文學代表當世，是要看其所說的話怎樣？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是以古文（非全古文但非白話）寫成，並未減其時代上的價值；小學初學作白話文，雖竟不知古文，而所作之白話，亦不儘有若何意義。況且古文，胡說博士亦說：

中國的民族「自從秦漢以來，土地漸漸擴大，吸收了無數的民族。中國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鮮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眞蒙古滿洲，在南方征服了無數小民族，從江浙直到湖廣，從湖廣直到雲貴，這個開化事業，不但遍于中國本部，還推廣到高麗日本安南等國，這個極偉大開化事業，足足費了兩千年。在這兩千年之中，中國民族拿來開化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國的古文明，而傳播這古文明的工具，在當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們可以說，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國民族教育自己子孫的工具，還做了二千年中國民族教育無數亞洲民族的工具。

而且實驗

這件事業的偉大，在世界史上沒有別的比例，只有希臘羅馬的古文化。靠着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費了一千年的工夫，開化北歐的無數野蠻民族，只有這一件事，可以說是有同等的偉大。

這樣的傳統，也算難得罷！也算照此所說的東扯西拉的「白話中心」，要活得多罷！

胡說章第五　白話有史文學無史

開宗明義「我爲什麼要講白話文學」裏，「第一」所「要」說的：

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揑造出來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歷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歷史的。

靜肅！聽他道來；

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了；七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做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

靠近一點，拿真憑實據來了！看罷：

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

而且

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上，那一樣新文學不是從民間來的？

那末換句話說

民間來的文學，怎樣不可以作史？

他「抱歉」過的，他「不曾從三百篇做起」，好在陸侃如馮沅君「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學史」，「好補他（我）的書的缺陷」。並且他還「希望將來能補作一篇古代文學史」然而從漢代的民歌起，到唐的元稹白居易，總算被他作成一部史了！他說過：

這書名爲白話文學史，其實中國文學史。

而且他把

白話文學的範圍，放的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

在「這樣寬大的範圍之下，」可憐那

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眞是僵死的文學了。

那些「被排斥」而「僵死的文學」，還有什麼史的可言？不過，白話文學史，就是史的中心部分，」這個「中心」的質量，和「被排斥」「僵死的文學」，勝過多少？不錯，

手頭案上堆着無數名家的專集或總集，這個毛病，是很普遍的。

「西洋的文學史家，往往不肯舉例」，也「是沒有趣味的」，「沒有多大用處的」，但只舉「某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首兩首「作品」，不計它的本身同意義的，或不同的成分中之幾分，這樣倒很有「趣味」！有甚「實用」？更建得起「中心」來嗎？

胡說章第六　古文死未死白話活難活

古文傳統史，乃是模倣的文學史，乃是死文學的歷史，我們講的白話文學史，乃是創造的文學史，乃是活文學的歷史。

古文什麼時候死的？

因爲公孫弘的一篇奏章，證明了古文在漢武帝時已死了。

公孫弘奏章內，怎樣說？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原註：史記漢書儒林傳參用）

怎樣證明法？

這可見當時，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這可見古文在那個時候，已成了一種死文字了。

但古文是怎樣死的呢？胡說博士未有找出前因，倒被他找出後因來了。所以接着說：

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種政策，叫各郡縣挑選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師，讀書一年，畢業之後，「補文學掌故」缺。（原註：也見儒林傳）又把這些「文學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國的「卒史」與「屬」。當時太學，武帝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經，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資格，是「先用誦多者」，這樣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識，傳播到各地了。從此以後，政府都只消照樣提倡，各地方的人，

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讀古書，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爾雅的古文。

這一派胡說，道地的胡說！「因此」，是不是「因此」？胡說博士未拿「證據來」，我們只好認爲胡說。不過就這種胡說，認定是「證明」死了罷！那末，以後的政府想出「一種政策」，「保存古文的絕妙方法」，已是死而未死了。後面又說：

拉丁文沒有科學的維持，故死的早，中國的古文，有科學的維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權威。古文已是東漢武帝時死了，怎樣這裏的又有權威呢？

白話文幾時起始「活」的？據說：

因爲公孫弘一篇奏章，證明了古文在漢武帝時已死了。所以我們記載白話文學的歷史，也就可以從這個時代講起。

漢朝恰當古文學的死耗初次發覺的時期，恰當做我們的起點。

那時「活」的程度怎樣？

漢高祖的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雖是皇帝做下的歌，却是道地的平民文學。

戚姬的

子爲王，母爲虜，
終日舂薄暮，
常與死爲伍。
相離三千里，
當誰使告汝！

這也是當日白話文學。

劉章的

深耕，概種，
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

鋤而去之。

這也是一首白話的無韻詩。

不錯，郊禮歌那些

廟堂的文學，可以取功名富貴，但達不出小百姓的悲歡哀怨。

但大風「安得壯士兮鎮四方」的氣度，是小百姓能夠達出嗎？戚姬的「子爲王母爲虜」的境遇，是小百姓能夠達出嗎？耕田歌「鋤而去之」的含義，是小百姓能夠達出嗎？這些是廟堂或貴族文學表現呢？還是白話或平民文學的悲歡哀怨？

楊惲所寫的民間文學環境，總算是民間文學或平民文學或白話文學；但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爲萁。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也只能代表一部分消極的平民，作有閒的消遣，在漢代整個文學領域中，是佔極小極微地

位。

一種史的敍述，是有淵源，有沿革，有繼承不斷的遞變。白話文學的起源，要以胡說博士所說「國風來自民間」爲最早，但至早的國風來自民間，是經過詩人一度采集來的。那些，是不是將所采集的一字不加修飾，而記錄出來，由國風文學中，是很可疑惑的一件事。而那些形容詞，如

窈窕

參差

輾轉

崔嵬

等等，最爲顯著。如果這些都認爲是沒有經過嚴密組織過，那時是絕對的文言一致，那末以後所說的漢代的民間文學，一直到清代的白話文學，是不是有一線索可連串起來？不然的話，只是東拾西湊，這樣的一「話」，在掙命的「活」怕難「活」下去罷！

胡說章第七　古文的末路與白話的前途

胡說博士是這樣肯定的告訴我們：

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

怎樣見得？他看到

當吳汝綸馬其昶林紓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時候，有個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場現形記，有個劉鶚也正在做老殘游記，有個吳研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當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韓愈歐陽修的肖子的時候，有個吳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個曹雪芹也正在做紅樓夢……再回頭一兩百年當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極力模做秦漢，唐順之歸有光極力恢復唐宋的時候，水滸傳也出來了，金瓶梅也出來了……這樣倒數上去，明朝的傳奇，元朝的雜劇與小曲，宋朝的詞，都是如此。

所以

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種下了近年文學革命的種子，近年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給一段長的歷史作一個小結束。

郭末

從以後，中國文學，永永脫離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創作的新路了。

說是種下了「近年文學革命種子」，我們承認，要說同時古文興盛到那樣同時僅僅有了這幾部小說就認爲是「古文的末路」。一，它還「末」，「末」得那有這樣長久。二，它還「路」，不僅不是「末」，而在古文歷程中看，正是「坦途」呢！

胡說章第八　辛苦徒辛苦

胡說博士所謂「辛苦得來」的如

（一）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

（二）建安文學的主要事業在于制作某府歌辭

（三）故事詩起來的時代

（四）佛教文學發生影響之晚

（五）唱導梵唄的方法的重要

（六）白話詩的四種來源

（七）王梵志與寒山的考證

（八）李杜的優劣論

（九）天寶大亂後的文學的特別色采說

（十）盧仝張籍的特別注重

「這些見解」，他

很盼望讀者特別注意，並且很誠懇地盼望他們批評指教。

這當然是謙虛的話。其實他的意思，是要人知道他這「辛苦得來」的如上「個人見地」。既然要人「特別注意」，要人「批評指教」，自然有很可自負的地方。我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我們只要指出他的幾點謬說，其餘也可推知了。

（一）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在胡說章第二，已經略略說過，此處從略。

（二）建安文學的主要事業在於制造樂府歌辭。「這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運動」，曹氏父子代表文句，自以五言詩體為能上承秦漢，下啓六朝。他人思想，亦以五言詩為有建設，至「依新曲作新聲」之語，實亦無甚高深。然根本問題，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諸人

，既非平民，亦非來自民間，一切白話成份，在各個著作中，與文盲成份比例之，亦甚少。

（三）故事詩起來的時代。

（四）佛教文學發生影響之說。

（五）唱導梵唄的方法的重要。

三節因手邊無參攷書，留待有機會出反白話文學史時再說。

（六）白話詩四種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民歌，自然無問題。第二個來源是打油詩。然「文人用詼諧的口吻，互相嘲戲」，不一定全屬白話。所舉的應據「諧詩」不「諧」，左思嬌女只「嬌」，滑稽賓子是「賓」，程曉的嘲客可算「嘲」，王褒的僮約亦很「諧」，但這一類的來源，有多少呢？第三是歌妓。在章二中已說過。第四宗教與哲理。此所舉名稱事實，亦殊曖昧，不足據。

（七）王梵老是什麼東西？胡說博士竟壓去八頁地位，考證他。要不是他有些「辛苦」，在巴黎在董康先生處「得來」一些故事，你能夠相信這許多勸世文式的詩，而能佔白話文學地盤嗎？

（八）李杜優劣論。只是略述李白的志行，與白話文學何干？

（九）天寶大亂後的文學的特別色采說。照他所指點於我們的看去，只是杜甫一人，做詩的前後背景不同。但這是事實，這種事實，留心到一人的文學境界，是並不算什麼。不過是還沒有胡說。

（十）張籍何足「特別注意？」只要讀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

爲詩意若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

巳不是一個「有什麼話說什麼話」的人，而遺韓愈書

這種「道貌岸然」假做作的態度，能寫出平民真實的詩來嗎？然而胡適竟能夠在全集中「特別」又「特別」找出幾首來，難得！難得！

盧仝一狂人而已，竟佔去二十頁的地位！胡說博士「特別注意」的是什麼地方呢？「永與同心事我郎」，那種小資產階級態度，既要妻，又納妾，還要她們倆不吃醋，能夠寫出多少平民意味來？

由前面八章，和上面幾篇看？我們除了看見不死不活的思想外，一個人見地一[illegible]

個人見地」，然而他「辛苦」了！「辛苦」亦徒「辛苦」罷了！

握手再會

話已說得不少了！應該告辭作別，不過親熱一下，握握手罷！

一、白話文學史，不是白話，不是文學，不是史。

二、白話文學史，不是白話文學，不是文學史。

三、白話文學史，不是白話文學史。

最後照例說一聲

再會！

——但不必「留待十年」，只要有某某先生來信，提出「特別贊成」，我便「不好意思」，二十萬字的反白話文學史，馬上可以斷見。

四、國學書目的高低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實在是一個高不高，低不低，不知高低的東西。說它是高罷，任你做那種學問的研究，都是不夠；說是低罷，不僅不是一般大學生財力所能辦到，也不是一般大學生精神都能做到，總之是個亂七八糟垃圾桶。

「國學」這個名目，算什麼？我不懂得！有些人在那兒做詩填詞，說是「國學」，有的在那兒編四部書目，說是「國學」、有的在那兒改頭換面加上一些新的名詞，如哲學名學等等，也是「國學」。

這些都不是現在我所要討論的問題。不去說他。胡適有人說他對于西洋哲學是有研究，因爲他曾介紹過「實驗主義」；有的却說不然，他的西洋哲學，不如他的「國學」，他在改討論「文學改良」時，他的文章裏，能夠引出許多小說的書名，並且他還做了一部中國哲學史，不看見他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裏，他能夠羅出許多書名，確不容易。「實驗主義

」，中國哲學史，另有專章批判，這裏我們來看他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罷！

關于書目，這一種的學問，中外古今都是有過專家去做。「國學」這一個名目，本來已不是僅拿着死舊本子去可代表，就拿書本子說，也不是只拿經史子集幾方面就可概括全部。目錄學家，是在分門別類，提要鉤玄，指示一般書的概略：學者開示某種書目，是在指導一般讀者的門徑。胡適這篇最低限度國學書目前者固然說不到，後者亦嫌不配。我們只要稍為指引，已是漏洞百出，體無完膚。

（一）思想錯誤

序言裏面說：

……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我起初也學着老前輩們派頭，從小學入手，勸人先通音韻訓詁。我近來懺悔了！那種話是爲專家說的，不是初學人說的；是爲學者裝門面的話，不是教育家引人入勝的法子。音韻訓詁之學，自身還不曾整理出個頭緒系統來，如何可作初學人的入手工夫？十幾年的使我不能不承認音韻訓詁之學，只可以作學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學的門徑。

這些話看來未嘗不對，訓詁小學，經過清代多少學的整理工夫，方才治出一點眉目，但這些眉目，固然是可做學者的工具，初學的門徑，也不是全爲無用。譬如胡適書目內，所開的章氏叢書，不懂小學的人，叫他那裏看得懂？

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

治國學那是這樣簡單事？「歷史的線索」，有時候是靠不住的，宋儒以孔子做招牌，做書目的人，把他們放到儒家裏去，總不能說是錯誤。但一看這班宋儒，沒有那個不是受佛學思想的。「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亦是不對的。老子的道，一演而爲漢的黃老，再演而爲晉的老莊，三演而爲唐的道教……我們要不從它橫的方面，看它所受時代的怎樣反映，僅僅憑着舊的四部或九流，這樣的系統去治國學，是治不出什麼來的。

這個書目，不單是爲私人用的，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圖書館之用。私人治學所備書目的書籍，決不是中小學圖書可適用的，中小學校所需的書籍，也決不是地方圖書館所適用的。而且就以學校論，中學與小學的圖書館，決不能適用同一的書目。胡適

是到過歐美各國的，曾看見有一種書目，可適用于各種圖書館嗎？這點普通常識都沒有，還要來談門徑！

答覆清華週刊記者信裏說：

我暫認思想與文學兩部，爲國學最低的門徑，其餘民族史，經濟史等等，此時更無從下手，連這樣一個門徑書目，都無法可擬。

思想與文學兩部，是國學最低的限度嗎？聯系各種思想貫串許多文學的「史」，是不值研究國學的一題嗎？那末只是一本一本的諸子讀下去，各種全集讀下去，都要各人把它理個系統來，何如先有一個「史」的觀念，較爲捷徑？沒有史的觀念各種思想，各種文學，那裏看出時代性。

……我也曾想過，這個書目動機雖是爲清華同學，但我動手之後，就不知不覺的放高了，放寬了。我的意思，是要人用這書目的人，從這書目裏，自己去選擇，有力的多買些，有時間的多讀些，否則先買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後還可以自己隨時添備。若我此時先定一個最狹義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沒有伸縮餘地了。

呵呀！胡適開的書目，是有「伸縮餘地」的，是「要人從這書目裏自己去選擇」的，但怎樣「伸」法？怎樣「縮」法？怎的去「選擇」？我們拿着商務書店的書目，它把經史子集分得很清楚，不可以選擇嗎？「有力的多買些，有時間的多讀些，否則先買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後還可以添備」。這些說法，直是「老生常譚」，又何需乎胡適？

「做留學生的如有深讀過圓覺經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這一層到有討論的餘地。正因爲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薄菲，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後也沒有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學生或後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

留學生「多讀點國學書」，是要「能代表中國」要「有多大影響」嗎？史記漢書可以不必知道，資治通鑑可以不必知道，元曲選留學生爲什麼應該知道？

（二）分類不清

胡適國學書目分爲三。

胡適與郭沫若著

（1）工具之部；

（2）思想史之部；

（3）文學史之部。

工具分一部是可以的，思想史分一部，文學史分一部，是什麼意思？思想史部分內，除了中國哲史大綱宋元明學案淸代學術概論是思想史以外，大多是思想史的材料，或直可稱之爲思想。這是不當之一。

文學史，其誤與思想史一樣，而春秋左氏傳列入，這是不當之二。

史爲一切學術研究之出發點，不明歷史，尙談甚國學？胡適竟拋之于九霄雲外，這是不當之三。

（三）舉書不當

1. 工具之部，有經籍纂詁有經傳釋詞，甚至有佛學大辭典，而無說文段氏注。

2. 有中國人名大辭典可不必要史姓韻編，要史姓韻編，所刊書目竟無二十四史，有何用處？

3.易經爲中國古代思想最重要之書，竟不列入。

4.佛書刊至二十三種之多，何所必要？

5.有正誼堂全書，復刊二程全書朱子全書。

6.沒有史記而有史記探源。

7.考信錄爲考訂古史之書，沒有尚書禮記國語，要他何用？

8.列朝詩集爲明詩彙刻，復重列明詩綜。

9.曲苑內有曲錄，旣舉曲苑又列曲錄。

10 湖海文傳湖海詩傳均爲乾隆後詩文集，應列淸文匯及淸詩別裁。

11 笠翁曲，據我所知道的，爲十種，是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凰求鳳、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塡鸞交，書目所列爲十二種，不知何所本？

由以上略舉十例看來，胡適對于國學知識，概可想見。而易經書經禮記國語史漢三國可以不要，小說如今古奇觀三俠五義九命奇寃恨海等必羅列多種，梁啓超說胡君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和所

邏輯的材料。

實任要治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此等書目又嫌不足，而一般大學生，旣無力逼購此數千冊之書，卽能力有餘，全部讀完沒有數十年時間不能，能讀完而國學仍國學，能依據其思想史或文學史得一系統概念嗎？竟算全知國學了嗎？胡適恐怕也不敢答覆這句話罷！

附錄

一　胡適著譯一覽

（甲）總集

胡適文存一集
胡適文存二集
胡適文存三集
胡適文選

（乙）專著

先秦名學史（英文）
中國哲學史
白話文學史

章實齋年譜
戴東原的哲學
淮南王書
廬山遊記

(丙)編選

詞選
神會和尚遺集
人權論集

(丁)翻譯

短篇小說第一集

二 郭沫若著譯一覽

(甲)創作

A. 詩

詩

（據沫若詩全集去女神三部曲及童話劇）

B. 戲劇

女神之再生

湘累

棠棣之花

廣寒宮

王昭君

卓文君

聶嫈

C. 少說

塔

1. Lofenicht的塔

2 鵷鶵

3. 函谷關

4. 葉羅提的墓

5. 薦引

6. 陽春別

7. 喀爾美羅姑娘

落葉

漂流三部曲

1. 岐路

2. 煉獄

3. 十字架

4. 行路難

後悔

1. 到宜興去

2. 倘儒村

3. 百合與番茄

9. 紅瓜
10 路畔的薔薇
11 夕暮
12 水墨畫
13 山茶花
14 墓
15 白髮
16 牧羊哀話
17 殘春
18 今津記遊
19 月蝕
（按此依沫若小說戲曲集所分並先後）

（乙）論著

胡適與郭沫若

文藝論集

文藝論續集（已禁止）

我的幼年

黑貓

反正前後

創造十年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甲骨文字研究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兩周金文辭大系（日本出版）

金文叢考（日本出版）

（丙）翻譯

A. 詩

沫若譯詩集

魯拜集

雪萊詩選

德國詩選

新俄詩選

卷耳集（古詩——詩經國風——今譯）

B. 戲劇

浮士德（歌德）

銀匣（高爾斯華綏）

法網（高爾斯華綏）

爭鬥（高爾斯華綏）

異端（霍甫曼）

約翰沁孤戲曲集（約翰沁孤）

C.小說

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

茵夢湖（施篤謨）

石炭王（辛克萊）

煤　油（辛克萊）

屠　場（辛克萊）

新時代（屠格涅夫）

D.其他

美術考古學發現史

社會主義與社會組織（河上肇）

胡適與郭沫若

譚天 著

II 郭沫若

一、創造前期的創造

說也奇怪，所謂「文學家」也者，他們的出身，並不一定是文科裏面高材生，他們儘可是習的與文科不相干的課程，而走入文藝的途徑；創造社中的如郁達夫，如成仿吾，如張資平，郭沫若當然亦是其中的一個。

但郭沫若到底是富于文藝情愫的人，他幼年時代便已處處表現他的文藝天才，對于文藝的興趣，他在日本進醫科，據說：

自己本是傾向文學的人，受着時潮影響，反乎本性地到日本來學習醫科。（創造十年八五頁）

所謂時潮的影響，這大概是民元的革命鼓盪，和五四的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罷？他說：

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是決心把這個傾向（文學傾向）克服的，在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國家主義者。那時的口號，是所謂「富國強兵」，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誰都是想學些實際的學問，來把國家強盛起來，因而對于文學有一種普遍的厭棄。我自己是在這潮流之下逼着出了鄉關。出了國門的人，雖是有傾向于文藝的素質，然而存心地要克服它，這就是我所要學醫學的原因。

但勉強箝制，早遲是有必然的暴發，況且餘情未泯，所以在先「無心之間同泰戈兒接近」，「便成爲了太戈兒的崇拜者」，嗣後讀了歌德的自敍傳創作與本事，又把他

用力克服的文學，傾向助長了起來。

但是內心的矛盾，形成無所適從的痛苦，他幾次想入文科，「經朋友勸助」，他幾次厭棄醫學，和安那（他的日本妻）反目，最後他是勝利了，朋友的勸助無效，安那也因爲

看到後來，就像成爲瘋人一樣，滯在家裏幾個月不進學校，她就讓我（他）把醫學拋掉。

一反她以前

不要我（他）改學，不要我（他）回國的態度，反而

鼓勵我（他）執行了既定的計劃。

于是乎郭若從此走文藝之途了。

沫若最初一部創作，是由臨床幻想上得來的，這自然也是他富于文藝的情懷，而方能感覺出來。

它的本事：是由一個日本學生口中說出漁師齋藤寅吉的故事，因為他們解剖一個因屍，屍體上發現有人物畫，探詢的結果，而引起了他的文藝興趣。

事情是這樣：有一家名門的女兒名叫濱田愛子，在夏天行海水浴時淹死了，屍體打撈上岸，待明天警官檢驗時，半夜裏已經失了屍身，不知去向。後來發現一個漁師——即齋藤寅吉行跡可疑，偵探結果，在他魚船中，發現失去的女屍已經是半腐了。這自然是這個漁師喪妻已後的色狂，給了這位千金小姐死後蹂躪。

漁師是判決絞刑，漁師的屍身送給沫若學校裏解剖，使他們有機會發現屍身上有裸體女人像的文身，旁邊還注有「瀰吉愛子」四個字，這自然是漁師在囚獄中思念他死情人刻畫出來的。沫若

在這樣怪奇的骨絡特斯克的 Grotesque 雰圍氣中，

他的

最初創作慾活動了起來。

於是他

採用着歐洲舊式的小說體裁，

最後加了一段，自己「將這文身的一塊皮膚割下來盛了酒精」回來，接着「做了一場」

喂！還我的愛人來！

的夢，遂以終篇。他

自己苦心慘淡地推敲了又推敲地把它寫在了紙上，草稿也改易過兩三次。

題名「骷髏」，自己以為是很得易的，但東方雜誌編輯先生，那時還未預料到將來有這麼聲

名赫赫的文人，自然厚遺本體，沫若很具有禮貌的給它最後的獻禮——火葬。

沫若第二篇創作，是「牧羊哀話，」它的產生期，是剛歐戰結束後，巴黎和會在開分贓，「山東問題」是擺臺上，大概是觸動他經過朝鮮的印象，引起了他不平的哀語。

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鮮人的心裏。

他那幾首「牧羊歌」和「怨日行」，寫來很能感動。他說

在結構上和火葬了的「枯髏」，完全是同母的姊妹。

但我看來，不但結構比「枯髏」緊湊，意識亦比「枯髏」要興奮多，雖是想像，而這種想像，却能燃起一般愛國熱。

這篇東西，雖是曾寄給他長兄看，但遭他長兄責備。他後來寄到北京刊行的新中國雜誌，居然得了編者的稱許，居然登載。居然還得兩本雜誌的報酬！

第三篇要算是「鼠災」，這篇他無存稿，我們也未見着，據他說

比較那「牧羊哀話」和火葬了的「枯髏」，要算是進一步的創作。

同時，沫若是

在小時本來就是喜歡唸詩的人 因爲我們母親愛從口頭教我們暗誦唐宋詩人的五絕七絕，在國內的中學校肄業幾年間，科學方面教員們是靑黃不及的資料，不能夠喚起科學上的興趣，我自己也就只得在古詩古學裏面消磨。

可見他受詩的陶冶很深，自然對于詩的風味，很是濃厚。他

第一次看見中國的白話詩，是康向情的一首「送甚麼人往歐洲」詩，裏面有「我們叫得出，我們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當稍有出入）的一類話，我看了不覺暗暗地驚異：「這就是中國的新詩嗎？那嗎我從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嘗不可發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岡山時做幾首詩「死的誘惑」，「新月與白雲」，「離別」，和幾首新做的搜集了去；這次的投機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學燈上登了出來。看見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鉛字，眞是有種說不出來的陶醉，這便給與了我一個很大的載刺，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

不消說，沫若是走上中國新的文壇了。

其實這幾篇最前期的創造，還是青年浪漫心理，所謂文藝，亦不過有感而發的，談不到什麼表現，什麼態度。

五四運動後，青年心理差不多共同都激起了愛國狂熱，自然沫若是有血性的，

五四以後的中國，在他（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

所以他的那篇

鳳凰涅槃，

便是象徵中國的再生；

「眷念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

便是我對于她的戀歌；

「晨安」和「匪徒頌」，

都是對于她的頌詞。特別是

「匪徒頌」，

那是憤慨于日本新聞界的揑詞，那時候日本人稱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學生爲「學匪」，我感覺無限的悲憤，爲抗議「學匪」的誣衊，便寫出了那首頌歌。

但不久他無形將這「恢鉄曼式」豪放粗暴時代拋棄，一方面撇了太戈兒而陶醉于歌德懷中，而「成爲韻文的遊戲者」，于是遂產生了

棠棣之花，

女神之再生，

湘累，

孤竹君之二子

許多詩劇，據說都是

在翻譯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後……在那個影響之下寫成的。

他這些唯一表現，就是反抗精神，這不消說得，是社會所給與不滿足的印象和經濟給以壓迫的效果，使之處處流露憤懣的情態。

二、創造洪水文化批評三時代

創造社組織的動機，最初是因沫若和張資平談話，對國內出版的雜誌不滿，如東方雜誌，如小說月報，如學藝雜誌，而且找不出純粹的文藝雜誌，他們想出一本文學雜誌，準備拉郁達夫成仿吾計劃每日從官費裏面，抽出四五塊錢來，以做印費，沫若「就已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這算是創造社的受胎期。

他們兩人議決後，不消說是分頭寫信給他們的友人，並曾在東京在達夫的寄宿處開過兩三次會，第二次壽昌出了席，討論的結果，是壽昌自行擔任在國內找出版處，並要邀些國內的朋友來參加。第三次開會時，壽昌沒有出席，出版處的消息，也沒有下文。

「沒有下文」，好像小孩在母懷裏震動了一次，又鎮靜下去，仍睡在她母親背襞裏。

仿吾沫若同回上海，本來的意思是想進行雜誌出版，但未能如願，沫若又跑了一趟日本。「創造」兩字是沫若一個人臆想的他說：

季刊用什麼名目呢？誇張一點的，便是「創造」？謙遜一點的，可以命名為「辛夷」，名目大誇太了，要求名實相副。……所以沒有決定，經達夫贊同，這「創造」的旗幟，在國中遂露出頭角。

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旬，沫若會見了好些朋友，會見了資平和何畏……也會見了徐祖正。達夫當然是在內。

大家的意思，也都贊成用創造的名目……這個會議，或者可以說是創造社的正式成立。

創造季刊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號勞動節日出版了，這自然是引起國內一般人的注意。首先同他們打筆墨官司的是胡大博士，原來創造創刊號達夫發表了一篇夕陽樓日記指摘少年中國學會的余家菊，由英文重譯出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的錯誤，但自己卻將establish一字，誤譯為「建設」，胡大博士把牠更正不算，還把它重譯出來，可是又演了一齣錯中錯，While 也譯成「雖然」起來了。

這裏却連帶引起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重譯有些地方，實在是不可靠。據沫若說：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是德國哲學家威鏗的著作，……德文原文我所有的是第四版，和英譯本的內容完全不同。達夫所指摘的幾句，是被删除了的，英譯本所據的是初版。……初版的原文和英譯文，都很有距離，原文只是半句話的文章，英譯竟譯成了好幾句，胡大博士的重譯，不用說是隔了十萬八千里了。胡大博士的結果，仍然是錯了的。（參看創造季刊第三期中「反響的反響」）

這當然是胡大博士一方面擺出學者面孔，說他們

淺薄無聊而不覺；

一方面又拿出前輩的派頭，說

彼此都是初出學堂門的人，相差也是有限（大意如此）

所引出來的反響。然而總怪自家淺薄，但却熱鬧一時。

張東蓀來參加過這場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形而上學序論」的指摘：張東蓀的「手式戲」宣傳了一時，成仿吾的「黑旋風」也就因名滿天下。吳稚暉也來參加過

這場官司，接着是引出陳西瀅對于茵夢湖的指摘，還有是詩哲徐志摩在努力週報上罵了我（沫若）的「淚浪滔滔」。……

不過這還是消極的詰難，到了第二週年，又出了一種創造週刊，第一期仿吾的「詩之防禦戰」，又引起許多人的爭辯，得罪了如胡大博士，如周作人，如文學研究會一般人不算，自己內部也起了分化，張鳳舉徐祖正無形是因看這一戰戰跑了的。

以後又在中華新報擴充一種日刊，名為「創造日」。剛滿百期，又歸夭折；繼之達夫一走，創造週刊已成強弩之末，季刊又難繼續，沫若跑回日本，達夫到上海就馬上發表，據說沫若還把他

那不值錢眼淚清算了一場

其實這次結束，正是結束創造社第一期個人的浪漫的色彩思想。而且那時剛值五四運動的前夜，那種色彩不轉變，是決不會能的繼續下去的。

直用季刊繼着五冊的餘浪更兇猛的汎濫出來，沫若仿吾都到廣東參加實際的工作，于是出了洪水又出創造月刊。理論上以革命旗幟相號召很掀起一時文壇上的波浪。最先發表的沫

目次

論胡適

一　前言

我以下列兩點理由著手寫這篇文字：——

一、胡適博士（這是美國文獻裏習慣尊稱胡先生為「Dr. Hu Shih」的中文翻譯，是為了尊重胡先生盛名的來源而採用，別無他意。）和他所能支配，影響的中國一部份社會力量，對於中國的進步曾經有所供獻，其中至今也還包含有可尊敬的學術中人。但是胡博士本人卻過於看重了自身——就是胡博士論「不朽」中的「小我」——的利害，以至於不惜蒙混是非，顛倒黑白，損傷了學人的尊嚴，妨礙到大家所託命的公同社會——就是論「不朽」中的「大我」——的進步與發展。這情形已經有不少年了。胡博士為了這個也已經背負了不少年的責難與輕蔑。隨着災難中的中國生命的推演，到今天更際遇着胡博士的這個不良惰性可以發揮更妨害「大我」生活的影響，所以值得論列。

二、這第二點也可以說是第一點理由的引伸或註解。

胡博士雖然不治自然科學，但他很尊重自然科學的。首先，他的「哲學」（假如算他有哲學的話）據他說是最得力於赫胥黎和杜威（「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三一，商務版），而赫胥黎是生物學家，至於杜威呢，「杜威受了近世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最大，所以他的哲學完全帶着生物進化學說的意義。」（「胡適文存」第一集頁四四七，亞東版）可見得這「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又於胡博士主持教育行政的作風中，他可以對於新聘的同等資歷同等造詣的教授作分別等級的待遇，理學院的每每高於文學院的一級或兩級，更見出他推重自然科學的苦心，雖然不免有點委屈了他自己的本行。再如他對於世界自然科學家中曾經特別推重過微生物學家巴斯德，為此作過幾次演講。

所以，他一生諄諄教誨後生要「科學態度」，尤其立論要有「科學根據」，這就引入了我的第二點理由的正題。就在巴斯德創立的微生學領域內，近年來發現了新的事實，叫作「細菌移殖的漸進的毒性」。若干細菌學家實驗的結果，發現細菌的毒性可以變異，本來對於某種實驗動物無毒的細菌，經過輾轉移殖以後，可以變為有毒，而且愈經移殖毒性愈增強。例如，最普通的鏈球菌（Streptococcus hypervirulenus）對於一隻兔子的毒性並不太強，需要注射一立方厘米分量的菌苗，才能生效。可是經過次第移殖的手續，毒性可以增進

對只須一百萬分之一立方厘米的菌液注射就能殺死一隻約三公斤重的健康的兔子，（這是Marmorek教授的研究報告）

假使我們都和胡博士一樣地尊重科學，那麼，照我在第一點理由裏所說，胡博士之於中國，從前不只無害而且也作過點有益的事情，正如本來無毒的細菌一樣。（請讀者不要覺得這比擬刺眼，而要打起精神來看，這是爲了「科學的尊嚴」！）可是隨着中國現代歷史的推動，也就彷彿細菌的移殖一樣，胡博士可就逐漸變得對於中國有害，而且愈變其有害性愈强。例如，曾激起全國憤怒的美國兵對北大一女生横施强暴的事件，胡博士就可以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且隱瞞着自己的政治偏向，希望學生不作政治聯想。甚至對於法律問題，他又不說明究竟應當算是中國的法律問題，抑或應當算是美國的法律問題？難道中國法律上竟載着有關於美國駐軍强姦中國女子的條文麽？還是美國法律上載着有關於美國征服「友邦」的遠征軍人强姦那「友邦」的女子的條文呢？這種自患隱病，就至於含糊躲閃，曲袒外來强暴的說法，胡博士在從前是堅決不肯出口的。豈只不肯出口，而且一定會和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一樣，憤不可遏的。這證據就見於載在「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冊裏面的「李超傳」。李超是當年北京女子高師的學生，爲了逃避婚姻，經歷了一串困難，至於以病以死。這在今天該是好稀淡平常的事情，當年可引起胡博士的大篇文章。他說：「她本

來體質不強，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願，故容易致病……後來病更重，……遂死在法國醫院」（「文存」一集頁一〇七八）「李超傳」的煞尾還有這樣的話：「我替這一個素不相識的可憐女子作傳，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裏一篇長傳。……可以用做無數中國的女子的寫照，……可以算作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文存」一集頁一〇九二）胡博士在當年「李超女士追悼會」裏的沉痛致辭，我現在耳畔都還能彷彿一二呢。

從當年的李超小姐到今天的沈崇小姐受到的胡博士的不同的看待上，不只可以看出兩個時代的青年對胡博士自然會有如何不同的反應，而且也是胡博士「移植的毒性」的最好的說明。昔日的胡博士勉勵青年奮發向上，今天他卻只許青年萎頓長慝。這不只是一般常情的年齡的影響，還與他本來的氣質有關，是屬於可能有毒的那一類，經了時代的移植，毒性就愈總愈強了。

爲了這一點「科學」的理由，我按捺着感情竟浪費了這一大堆筆墨，抄錄些在今天了無意義的文字，原因就正是彷胡博士的所謂「科學態度」，「拿證據來」，好讓今天還迷信胡博士的人們看看。實際上，人類社會現象比細菌社會現象自有更複雜的規律，照嚴正的科學態度說來，這種「人本主義」（Anthropocentrism註）式的附會科學，是並不足爲訓的。然而胡博士欵思想就可以逍遙個圓其辭。例如他可以說：生物界的現象原來是複雜而且點滴

進化的，所以人類現象也是複雜而且點滴進化的。（「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一三的大意，下文再論。）

歸根結蒂來說，我的意思不過是像下面的要點：

自從中國舊社會漸趨解體，而一直還不曾建立起健康自主的新社會以來，知識份子中稍能以學術自見的，（除去篤於所學與所信謹慎自處的以外）大抵不僅擺脫不掉「學而優則仕」的老病根，而且還墮落到失去了舊時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更沒有爭取現代民主政黨政治的勇氣，而不過只喜歡抱着學術的琵琶，笑媚權要，從而討點鄙俗的自滿。笑媚的搬弄可以多姿，權要的性質也可以不問，甚至於不問它是同族抑或異族！所以嚴幾道可以為袁世凱「籌安」，周作人可以為日本「總監」教育。胡博士今天正臨着這相同的險關，尤其是在話美國獨佔性資本家集團還不肯放棄以軍事經濟的雙重威力迫使中國甘作附庸的政策的時候。胡博士未必承認這是「險關」；然而對於不能接受這個政策的中國人卻決不能忍受胡博士可能做出比嚴幾道，比周作人還更技巧，更積極的表演。

所以，我們今天值得清理清理胡適博士的脈絡。

〔註一〕這Anthropocentrism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歐洲生物學界易犯的一種不科學的傾向，動輒喜歡輕率地取生物界的現象強與人類現象類比，說明生物學研究初從經院派哲學裏蛻化的想趨

痕跡；與後來哲學上的Humanism並非一事。至於有些哲學家如柏格森，如杜里舒等則竟從某些生物現象作整個哲學思想發揮的根據，那就純屬哲學範圍了。

二　論其人的特性和通性，並勾畫輪廓

清理胡博士的脈絡，在今天已經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第一，作爲學術文化領域中一位學者來說，胡博士的著作等身，其中除去專門性質的中國哲學史以及古籍考證以外，大抵都流露着一種「孔雀開屏」體的風格，炫耀之氣撲鼻：不是一再申述「……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文存」一集二集自序），就是「……還積下這五十萬字的散文，合計也有一百多萬字，總算還有點成績了。」（「文存」三集自序）甚至於就專門性質之作，論中國哲學史，他說是旁人休想跳出他的掌心，意思是要見其大；而一般古籍的研究卻又以「一點一滴」爲最高的眞理，而且還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而且「考訂一個古字的眞僞，其價值不在天文學家發現一顆天王星以下」（這是齊物論的翻版，卻不是科學）。胡博士論梁漱溟氏的哲學時曾招來梁氏致書中有「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之譏。論張君勱氏的哲學則「我撥住了這翻過來的一段，仔細一看，原來他仍舊不曾跳出賽先

生和邏輯先生的手心裏！」（均見「文存」二集卷二）至於他初期盛名之下，曾經請過梁任公批評他的中國哲學史，而會後在講堂裏竟能對學生說出這樣的話：「梁啓超的批評，混賬之至！有的同學說要打他——！我看那倒也可以不必。」總之，作爲學者來說，胡博士的態度並不「科學」，意氣的排他性極强。這不只是他尊重的美國的杜威和中國的樸學家所不屑爲，寧近於中國文人相輕的舊習，而那露骨的自炫與排他，甚至於以出產多少字數作爲治學的成績，倒使人嗅出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裏面商標廣告的氣息。這就牽聯到——

第二點不愉快的事。像胡博士這樣氣質的學人，必不甘以學術自了；而作爲立言論政，立身行事，乃至「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這一方面來說，他卻墮入了我本文第一節裏的兩點理由之內，爲了自己的利益，惡化社會的影響。一方面，他宣說：「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道出他是喜歡文化與政治雙管齊下地努力的。另一方面，儘管他口頭推崇易卜生主義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實生活上卻總在那裏標榜同氣，不問主張，但有權門可傍，只須「弟兄們」搿脗着如何求售，不計其他。這種文化中人不負政治責任而必須問政的「獨立精神」，多年來出現在中國的政治商場，充分反映出不幸的中國的不幸文化。這種解釋無需乎牽聯上胡博士口頭上

推崇的自然科學，倒是近代進步的社會科學很容易加以說明：從內外雙重壓迫中推動着的中國社會，上層知識份子大抵依附着少數階級的統治者奔走勞心；留學生們尤其便於自私，儘管多少還保有學術的興趣，總難有毅赴再造中國的勇氣。胡博士是更標準的代表，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度裏面現象之一例而已。他們最好標榜獨立與清高，這種「獨立」的表現，就不只單從正面擺用那豔麗的「孔雀開屏」，而自然也就有時陳設用「錦屏」後面那排洩的肛門來了。

清理用胡博士治學，立言，以及作人的特性與通性以後，我現在想先勾畫用他的脈絡的輪廓：——

胡博士的年齡漨有趕上滿族朝廷的科舉取士，十四歲從動盪不安的故鄉到了上海洋場來求「新學」。「從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六年之中——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受了時報的許多好影響。」（「文存」二集，卷三，頁五）這時又承戊戌政變失敗之後，正梁啟超氏解放文體論政論新學的文字風靡若干年，像胡博士那樣改良主義氣質的知識青年，自少就容易接受這些不肯根本反抗現狀而只點滴修正癒趨愈惡的思想。地下革命的孫中山，一直不曾引起他們的注意，那是必然的事。不久，美國留華老傳教士 Smith 牧師向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建議退還中國庚子賠款，「拯救中國靈魂」招收中國學生留美的計劃實現，這方興未艾

的新型資本主義國家的「攻心」政策自來就比甲午戰爭擊敗中國那種「以力服人」者高明。胡博士得到機會留學美國，這就培置了他一生業績的基礎。

留美求學生涯中所學幾經改換，由農業而經濟學，由經濟學而哲學。據胡博士未發表的一部份藏暉室劄記裏所載，這時期這位關心國事的青年留學生願望回國後能以梁啓超氏那樣的新聞記者自見（這是胡博士回國後不久在北平允許他姪兒，思永給我看的文字，當時是我很興奮的讀物，我今天的印象只記得略存疑問，何以胡博士留學時期欣羨的人，回國後反而有點鄙夷他？）。由於中美兩國國情的懸殊，胡博士一方面對於美國社會的一切作無批評地接受，一方面又留有中國舊時典籍的根底，對於中國的文學與哲學更感興味。所以他對美國人論「先秦名學史」而一回中國就講詹姆士杜威的實驗主義。這種兩邊不接頭，兩邊好賣弄的「文化」作風，幾乎是二三十年來許多留學生們登龍秘訣的第一信條。胡博士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

他「學成」回國正當中國舊文化裏陶鑄出來的兩位卓越代表人蔡子民、陳仲甫兩先生輝煌事業發軔的時期，兩先生又都給胡博士以培護與揚掖，三四年期間胡博士頓成中國文化界的新寵。這時期又當歐戰及其後的疲敝，西方帝國主義者無暇高力箝制中國，中國開明的上層社會普遍有了突進的要求，胡博士在蔡陳兩先生旗幟之下以方興的銳氣着實盡了一番摧毀